

苏轼晚年轻南时期（1094-1100）及其“和陶诗”之研究

**A STUDY OF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
MING” BY SU SHI IN HIS LATER YEARS IN
LINGNAN (1094-1100)**

By

陈润隆

CHIN YUON LOONG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Ful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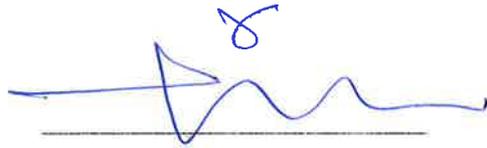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JUNE 2019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苏轼晚年岭南时期（1094-1100）及其“和陶诗”之研究为陈润隆，作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学位之论文要件。

此证



（余曆雄）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日期：2019年6月23日



（陈明彪）

助理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助理教授

日期：2019年6月23日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19年 6月 23日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陈润隆**（学号：14 ULM 05930）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余曆雄**博士指导下，经已完成此一题苏轼晚年岭南时期（1094-1100）及其“和陶诗”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人员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拉曼大学



（陈润隆）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之前或同一时间提交至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陈润隆

日期：2019年 6月 23日

摘要

苏轼晚年岭南时期（1094-1100）及其“和陶诗”之研究

陈润隆

苏轼晚年因为难以容身於朝廷，先后外任杭州、颍州、扬州与定州，其“和陶”始於元祐外任扬州时期。苏轼於绍圣年间被朝廷贬谪惠州，接着又再贬到海南，实乃人生之重大打击。本论文首先以苏轼扬州“和陶诗”作为研究的开端，再延伸苏轼绍圣年间贬居惠州“尽和陶诗”以至贬谪海南“随行有《陶渊明集》”与“常置左右”的创作背景进行论述，以此论析其意犹未尽的和陶心态。唯有梳理苏轼多次将生活经历反映在“和陶诗”的脉络，方能了解苏轼晚年岭南事迹与“和陶诗”的内在关系。接着，本论文将探讨苏轼贬谪惠州与海南所作诗、文与“和陶诗”的关系，再将“和陶诗”的主题与内容分类，并且结合后世评论者的评论，以此推论作者如何排遣其身处岭南期间的忧患心情，展现其随遇而安的豁达心态。最后，本论文将苏轼惠州与海南的“和陶诗”进行对比，以此理解苏轼与陶渊明晚年境遇以及作品思想之不同，探讨苏轼如何在效仿陶渊明以及超越自己的心路历程中，展现忧患仕途中的人生价值。

关键词：苏轼、“和陶诗”、岭南、人生价值

ABSTRACT

A STUDY OF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BY SU SHI IN HIS LATER YEARS IN LINGNAN (1094-1100)

CHIN YUON LOONG

In Su Shi's later year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e can never satisfy with his career life, therefore he transferred to Hangzhou, Yingzhou, Yangzhou and Dingzhou. His first creation of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began since when he was in Yangzhou. Unfortunately, Su Shi was banished by the emperor to Lingnan area which was Huizhou and later to Hainan during Shaosheng period, and this was a strike to his life. This dissertation firstly aims on the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of Su Shi's creation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since he was in Yangzhou until he came out with the thought to complete Poem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in Huizhou, and lastly immerse in the creation which he used to bring along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by Tao Yuan-Ming whenever he went in Hainan. Through the exposition of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which reflects Su Shi's life experience, this will refle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 Shi's life in Lingnan and his creation. Above analysis will then discusses the relation among Su Shi's poem, prose and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during Lingnan perio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me and content of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this dissertation also refer commentary against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to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how Su Shi overcome his anxiety and hardship in Lingnan. Lastly, this dissertation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between the two different periods when Su Shi created them in Huizhou and

Hainan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riences and thoughts of the creations among Su Shi and Tao Yuan-Ming in order to study the way of Su Shi imitating Tao Yuan-Ming and bringing out the life value beyond his difficulties in Lingnan.

Keywords: Su Shi, Poems in Reply to Tao Yuan-Ming, Lingnan, Life Value

目录

题目	i
论文核实书	ii
硕士论文提交	iii
论文声明	iv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学术史回顾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10
第二章 苏轼晚年“和陶诗”的背景论述	14
第一节 扬州“和陶之始”	15
第二节 惠州“尽和陶诗”	26
第三节 海南“陶写伊郁”	33
第三章 以己适陶，以陶适己：苏轼惠州的“择陶心态”	39
第一节 苏轼惠州事迹与“和陶诗”之关系	39
第二节 惠州“和陶诗”的主题分析	46
第三节 “和陶诗”与“择陶心态”	50
第四章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苏轼远贬海南与“穷途和陶”	61
第一节 苏轼海南事迹与“和陶诗”之关系	62
第二节 海南“和陶诗”的主题分析	67

第三节 从“和陶”到超越	73
结语	84
参考文献	88

表目录

表一：苏轼外任扬州，贬居惠州与儋州所作“和陶诗”之数量…	19
表二：苏轼生平“与陶相关之诗、文、词作”数量一览 ……	20
表三：与苏轼惠州生活相关/无关之“和陶诗” ……	32
表四：与苏轼海南生活相关/无关之“和陶诗” ……	38
表五：苏轼惠州“和陶诗”之主题分类 ……	47
表六：“和陶诗”与“陶诗”的创作背景 ……	54
表七：苏轼海南“和陶诗”之主题分类 ……	6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苏轼（北宋景祐三年～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世家眉山。苏轼晚年仕途沉浮不达，复又卷入党争漩涡之遭遇，因屡次自请外任以保全其身，后来安身立命服务朝廷。苏轼曾曰陶诗“质而实绮，臆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遂“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其亦自称“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2009：1402）。苏轼於元祐七年七月（1092年）自请外任不久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尽和陶诗亦始於此。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被朝廷贬至惠州，元符元年（1098年）再被贬至儋州（惠州与儋州皆为岭南一带）。

苏轼晚年贬居岭南皆有“和陶”之作，乃其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标志之一。苏轼鉴於晚年忧患处境之所需，始终视陶诗正合其意，因此成了其寻求个人价值以及精神寄托的诗作。苏轼介於元祐、绍圣以及元符时期的处境与境遇，远非陶渊明辞官归隐所能比拟，或称“和陶诗”兼出己意，而并非有关陶氏其人其诗。苏轼扬州《和陶饮酒二十首》看似偶然而作，但是后来没有了结罢笔，随着晚年贬谪岭南又继续作了不少“和陶诗”，不排除其借“和陶”诉说其内心独白，以及反映其生活经历的独特意义，此为本文之研究动机。

苏轼自托於陶渊明而出於陶渊明之外，能陶渊明所不能；其诗源于“陶意”而跳脱了“陶意”，更是渐次依着本意创造诗境与实境，以勾勒其於逆境中的自处与感悟，进而具体展示“和陶”的中介作用以及独特意义。《和陶饮酒诗》为苏轼晚年外任时作，《饮酒诗二十首》则为陶渊明晚年隐居时作。苏、陶作品的创作处境之不同，亦可见两者的可比之处。袁行霈（2003）曾曰：“和陶，在不同的程度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分

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149）。据上而论，本文以苏轼晚年岭南时期之所需，延伸探讨其为寻求自适的生活，并且依附创作来达到心灵慰藉的“和陶”目的。

苏轼晚年被流放到惠州与儋州，在思想心态上都会受到一定的挫折与落寞。除了苏轼，在宋代以前便有许多文人遭遇相同的流放命运，除了被朝廷贬谪到偏远之地，同时遭受异乡之苦，当中不乏屈原、贾谊、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张惠民对宋前逐臣心态的叙述中，提出了文人们被贬谪到异地的时候所反映的内心话语，如屈原所作《离骚》、贾谊所作《吊屈原赋》、韩愈所作《潮州刺史写上表》、柳宗元所写《寄许京兆孟容书》，均表示他们在文字抒发中透露了不少落寞的情绪。张惠民认为苏轼经历惠州与儋州之贬时，坦然面对忧患，顽强求得生存，尤其惠、儋两地亦有向往陶渊明的为人而作“和陶诗”。苏轼作为一个强烈民本思想，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政治家，不管在朝野，不管居官尊卑，都始终会关心民瘼。杨子怡在《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认为，有关苏轼对惠州以及当地人民作出的贡献，诗文皆有记载。这种惠民及物的思想到了其最低潮的后期（惠州）也未曾减少。

北宋学者胡仔、南宋学者黄震、金元之际学者元好问、清代学者纪昀、温汝能、赵克宜等人对苏轼创作“和陶诗”各持看法，论苏轼“和陶诗”之“似陶”、“不似陶”、“全然本色”皆有之。有鉴於此，后世论苏轼“和陶诗”以及结合苏轼晚年岭南境遇的研究，是为值得探讨之重要环节。本论文尝试引证辨析，苏轼和诗之旨乃“借陶而入，由己而出”而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继而延伸细观其他“和陶诗”的创作目的。评论者对“和陶诗”接受的程度各异，可谓各述各评¹，各家持有不同的看法。袁行霈在《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认为“和陶诗”的资料很多，可惜至今还没有得到系统整理。然而，学界对“和陶诗”的研究，还局限于苏轼等个别作家的作品。此

¹ 王友胜（2010）在《苏诗研究史稿》详述宋、金元、明以至清代，苏轼诗歌与“和陶诗”於流传过程因文学氛围之不同与时人及后人接受的情况，颇为细腻，可参阅之。

论文梳理与论述历代评论者对於苏轼“和陶诗”的看法，以及文人在宋代继续追和陶诗的情况。

金代文人评“和陶诗”的评点简略，较多时候摘句欣赏加以评论，并以诗歌比较的方式评论苏轼，将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梅尧臣及黄庭坚的诗歌进行比较。元代方回的苏诗评点集中在《瀛奎律髓》，此为弘扬江西诗风而编。方回评点苏诗多把焦点放在诗歌系年，写作地点，并将同一事件有关诗歌放在一起评点，以比较的方式评点苏诗。金末王若虚与元好问对苏诗所作的思考与评论较为典型。王若虚於《滹南集》卷三十九曰：“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纪昀、永瑆，2003：472）。元好问以杜甫、白居易与苏轼作一番对比，其《陶然集序》评述苏轼贬谪海南后的诗作呈现“不受牵绊”的诗歌之美曰：“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转引自林明德，1979：183）另外，元好问在《跋东坡和陶渊明饮酒诗后》亦有曰：“东坡和陶，气象只是坡诗”（转引自林明德：1979，187），以此说明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歌有别，依据苏诗的特色而作。

明代人的看法不如宋与金代，评论者张岱对“和陶诗”的看法偏向贬意，如《和停云》其一“通篇意味俱短”；评《和拟古九首》其八“徒具他人面目，不露自己精神，虽说的乱坠天花，终同嚼醋”；评《和刘柴桑》“万劫互起灭”一首曰“东坡毕竟是高华中人，凡说隐居，终带忙碌”；评《和陶王抚军座送客》曰：“古来处困，独彭泽一人，东坡记桃榔，子厚赋囚山，语虽旷达，终带牢骚”；评《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则曰：“东坡豪气未除，何得便言稼穡，虽费揣摩，终属勉强”（转引自王友胜，2010：136）。

清代人对苏诗的辑佚、校勘与考辨较为重视。清人注释苏诗更为合理与规范，内容翔实，这反映了苏诗在清代文人心中地位之高。苏轼“和陶诗”

收录在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注释上采用“合注”方式，资料翔实，注重苏诗系年，一方面引纪昀诗评。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采用诗注与诗评的结合。苏诗评点的特点，评语较为简略，多采用直觉式感悟，侧重艺术分析，诗歌特色以及修辞句法。这点与元明文人的苏诗评点不同，忽视诗人的写作背景、意图与诗歌思想内涵。纪昀为文史评点家，其《苏文忠公诗集》为清代唯一苏诗全集的评点著作，尤其评“和陶诗”的标准是以“似古人”与否以及创新来看，强调因承与革新辨正关系。清学者对苏轼和陶诗多以“似”与“不似”²的看法加以评论，优劣高下的问题分歧也大，如纪昀总评《和陶饮酒二十首》曰：“敛才就陶，而时时亦自露本色”（曾枣庄，2001：1479），总评《和陶杂诗十一首》曰：“十一首俱浑然深厚，逼近陶公，字句偶露本色，所谓形骸之外”（曾枣庄，2001：1838），其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二：“此不似陶，亦不见本色，殊不可取”（曾枣庄，2001：1482）。

黄宗羲於《万贞一和苏诗题辞》认为苏轼“和陶诗”在“似陶”方面稍微“勉强”，其曰：“盖子瞻、渊明出处不同，强欲以言附之。贞一挂名罪籍六百四十二日，魂飞汤火，甚于子瞻，患难既同，和诗能不亲切。其于陶苏之相去不俟矣”（黄宗羲，2012：92）。类似的评点如张谦宜《緹斋诗谈》卷五曰：“长公与渊明胸襟不同，气味不合，特可言用韵，和则相违。陶是袖手不肯做，自讨便宜。苏原攘臂要做，做不来更得祸，才收拾雄心，作恬退消沮语。此即相隔天渊，兼之骨格槎枒，声高气莽，都不是陶家路上人，强用其韵，了无干涉”（张谦宜，2002：661-662）。黄宗羲在《緹斋诗谈》卷五也认为“东坡《和陶诗》，豪气不除，鳞甲尽露，哪及其万一？前人不许并论，今见其实。大凡文字，摹仿便不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61）。此评论先分析苏轼的作诗特色，将苏轼“和陶诗”与“陶诗”进行比较后，认为诗歌文字与“陶诗”不相似。

² 本人曾探讨有关《和陶饮酒二十首》的“似陶”与“不似陶”的情况，详见拙文〈苏轼和陶饮酒诗中的“苏意”〉。（陈润隆，2016：204-208）

顾炎武於《日知录》卷二一的看法客观，其曰：“朱子《答谢成之书》，谓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纪昀、永瑢，2003：859）。类似的想法如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和诗”曰：“古人和意不和韵，故篇什多佳。始于元白作俑，极于苏黄助澜，遂成艺林业海。然如子瞻《和陶饮酒》，虽不似陶，尚有双雕并起之妙。至子由所和，竟不知何语矣……此诗和于秉政时，宜其强笑不乐也。然余喜其‘生平不饮酒，欲醉何由成’，反真率得陶致”（郭绍虞，1983：282）。

苏轼晚年以“和陶”塑造陶渊明在其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可见陶渊明对苏轼带来了不少的生活启发。此情况给予本文许多撰文的思考空间，以期探讨研究并且得出结论。苏轼曾在《评韩柳诗》论曰：“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而叶梦得曾曰陶渊明身处“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以及“人各惧祸”的时代背景，陶渊明“未必意真在酒”，只有“惟托於醉”方可“粗远世故”。陶渊明在非醉的情况下，借酒抒发内心的难言之隐。陶渊明所思考的人生道理，让其寻求生活的真正价值。苏轼则认为陶诗的本质，其实具有丰富与丰腴之内涵，让看似平淡的文意，其实表现了豁达的人生观。苏轼视陶渊明为心目中的人生导师，非但喜好陶渊明的诗作，并且欣赏陶渊明的为人。

苏辙曾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回忆其兄苏轼晚年仰慕陶渊明，以此追和陶渊明的诗歌。此悼念一文说明苏辙认同兄长晚年对陶渊明与陶诗的推崇以及喜好。袁行霈（2003）曾曰：“和陶这种文学活动所标示的主要是对清高人格的向往和追求，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161）。

此论文中心议题，乃针对苏轼如何在“和陶”的过程中，让苏、陶诗歌各自得以升华，使之丰富以及带来文字上的人生启发。苏轼视陶渊明为知己，故见苏轼“和陶”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之所在。本论文尝试以苏轼晚年岭

南时期与“和陶诗”的背景作为研究之开端，借此分析“和陶诗”的内容，同时对照评论者对“和陶诗”的看法，以期辨析苏轼分别於惠州与海南的“和陶”特色。研究意义可从辨别苏轼与陶渊明之间在人生感悟上之不同，得出结果。本文针对苏轼以陶渊明作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作为研究重点，以勾勒苏轼“和陶”的重要性，作为主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也尝试从苏轼“能陶所能”，以及“能陶所不能”之视角进行探讨。苏轼晚年境遇，陶或有不能“苏轼之所能”，然而苏轼以陶渊明作为了解自己的对象，透过“和陶”以进一步探讨其寻求自我价值的人生意义，此为笔者期望之研究成果，此为本文之研究目的。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学术史回顾

有关本文在研究方面的资料与文献参考，均可参考以下著述。研究苏轼的生平阶段、史载记述、生活事迹、时代背景等有孔凡礼编《三苏年谱》、《苏轼年谱》、元代脱脱撰《宋史》、王水照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而苏辙为亡兄撰写的墓志铭亦具有考证苏轼的生平作用，即《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另一方面，研究陶渊明的生平历程与事迹背景有唐代房玄龄撰《晋书》。

相关的史学著作，对本文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如房玄龄所撰《晋书》、苏轼著《苏轼诗集》、清代王文诰注《苏轼诗集》、脱脱撰《宋史》、纪昀撰的《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的《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相关的岭南地域参考资料有唐代刘恂著《岭表录异》、宋代王象之著《舆地纪胜》、南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等。其它的职官文献以及史载文献参考，有元代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以及明代陈邦瞻著《历代纪事本末》。以上所列举之书目，皆有助于笔者进行文献的互证，进一步提供笔者贴近史实的研究方便。

当前有关苏轼的研究著作或者专书作品，皆不胜枚举，如王水照与朱刚所著《苏轼评传》，此著作给予本文很大的思考以及参考空间。此著作在本文研究苏轼晚年岭南时期的仕途遭遇，提供了完整的解释，其中包括苏轼被流放到惠州以及海南的仕途遭遇，以及时代背景的主要参考。此著作也提供许多参考资料，如苏轼的家世与生平、苏轼的哲学与史学观、政治态度、文艺与美学观等等。

王水照所著《苏轼论稿》，给予本文归纳资料以便进行研究论述的空间。此著作分为综论篇、思想篇、品评篇以及谱学篇，包含了研究有关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苏轼进行的“苏门”文学活动、贬谪心态、生平研究等等。各项资料论述均给予本文研究苏轼“和陶诗”的方面，开拓了资料研究的视野。

曾枣庄所著《苏轼研究史》颇有特色，不仅分析了南宋、明、清时期与文人对于苏轼作品做出的品评与研究、整理与刊刻，也从事研究日本、韩国与西方国家接受苏轼文学作品的领域，可谓全面性地研究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苏轼诗歌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著作有王友胜著《苏轼研究史稿》。此著作详述了宋、金元、明以至清代文人，针对苏轼诗歌与“和陶诗”在流传的过程中，如何被历代文人所接受。另外，此著作也提供了历代文学氛围以及文学集团的文人，如何接受苏轼的诗歌以及提出的品评。对于此书研究时人以及后人接受苏诗的情况，其资料搜集、分析以及论述颇为细腻，是为一部值得参考的研究作品。

赵以武所著《唱和诗研究》，均提供了宋代以前，如东晋、南朝宋齐梁陈、隋代与唐代的和诗研究。此著作提供本文研究的一个参考空间，由此理解唱和诗歌在历代以来的流传过程已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编《中国苏轼研究》收录了许多中国以及海外对苏轼研究的发表论文，研究内容丰富多彩，集结了不同的角度探讨苏轼的文学作品。另外，王启鹏的著作《苏轼文艺美论》以文艺与美学方面的研究，来探讨苏轼在文学创作的思想。此著作

涉略一些苏轼文学作品的例子，论述苏轼在诗歌、词作以及文体方面的分析，以此辨别苏轼的文学想法以及创作观点。

另一部可供参考有关苏轼於宋代时期的苏门文人集团的研究，如杨胜宽所著《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此著作收录许多有关研究苏轼的论文，从各种角度如经学著述、文学观点、哲学与艺术思想、人生遭遇以及政治理念，提供读者理解苏轼在宋代时期所进行文学与政治活动，并且在人事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郑芳祥在《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梳理苏轼贬谪岭南的原因、同时期遭贬谪的文人著述、苏轼的诗歌主题等等。此研究细腻，并且给予本文许多启发，进一步以苏轼贬谪岭南时所作诗歌、此、文以及“和陶诗”进行比较，以期勾勒苏轼晚年岭南时期与“和陶诗”的研究意义。朱靖华所著《苏轼论》，其不仅以诗论、词论与文论研究苏轼的作品，同时在研究诗论方面以苏轼、李白诗作了具体比较，也有论述苏轼晚年的诗词以及《和陶诗》的评价问题，是一部研究苏轼文学作品较为全面的著作。日、美学界方面，相关的成果研究可参考内山精也著（朱刚等译）《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艾朗诺（Ronald Egan）著（杜斐然等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包弼德（Peter K. Bol）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宇文所安著〈地：金陵怀古〉（陈跃红、王军译）以及林顺夫著（张宏生译）《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

除了以上列举的研究著作，以下的论文著作也提供笔者很大的参考空间以及研究途径。王水照 2008 年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学生金甫曝，细观其撰写的〈苏轼和陶诗研究〉，则颇为细腻，从“和陶诗”的概况、背景、苏轼的陶渊明接受、和陶诗内容归类、和陶诗影响等诸多方面，皆给予了宏观的梳理与分析。本文在研究内容方面，以此承先启后，进一步从“和陶诗”内容比较扬州、惠州与海南“和陶诗”的特色以及差异。金强在《宋代岭南谪宦研究》分析了宋代文人的贬谪心理以及事迹考察，并且从岭南区域以及贬谪

文人的作品影响进行研究。金准锡在〈中国古代饮酒诗研究〉将陶渊明、李白以及苏轼的饮酒诗进行比较，从中论析诗作的风格特征以及分类研究，均得出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林红在〈苏轼与酒及涉酒诗研究〉亦针对“酒”的主题进行研究，探讨苏轼作饮酒诗的时代背景、作诗原因以及苏轼与“酒”的内在关系，以上研究内容均启发笔者进一步研究苏轼於惠州与海南时期“和陶诗”的主题内容之作品特色。另外，赵芳在〈苏轼海南创作研究〉的著述锁定苏轼於海南时期的作品进行研究，梳理苏轼在海南的创作心态、心路历程以及作品思想。

接着，与苏轼相关的作品书目以及历代评述作品，有吕慧鹃、刘波、卢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王运熙、顾易生主编；顾易生、蒋凡、刘明今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吴文治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曾枣庄与吴洪泽所著《宋代文学编年史》、曾枣庄编《苏诗汇评》、张宏生著《宋诗：融通与开拓》、杨子怡著《韩愈刺潮寓惠比较研究》等。据上而论，以上书目皆有助于笔者对历代以来文人给予苏轼“和陶诗”所作出的评述进行研究。

近年来，有关苏轼研究的论文发表，各别的学报、学刊所发表过有关苏轼“和陶诗”的作品亦对本文提供参考价值以及思考作用，以下稍微列举一二：袁行霈在〈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提出了苏轼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分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此论文主要论述苏轼透过“和陶诗”的创作，为自己找到了排遣忧患仕途的契机。另外，本文认为苏轼晚年於岭南作“和陶诗”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和陶诗”以外的作品皆有反映苏轼的生活经历。杨玲在〈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透过分析以及对比“和陶诗”以及“陶诗”，勾勒出苏轼欣赏陶渊明的一面。另外，柯镇昌在〈论苏轼和陶诗的创作缘由〉论述了苏轼作“和陶诗”的原因，梳理了苏轼如何以陶诗作为“和陶诗”的创作题材，相关的论文如薛天纬在〈师范渊明，唯取一适——苏轼为什么要写和陶诗〉层层剖析了苏轼作“和陶诗”的原因。

有关苏轼“和陶诗”的意蕴、创作理论、文化史意义的相关研究有李剑锋〈苏轼和陶诗深层意蕴谈论〉、高云鹏〈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王启鹏〈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惠州和陶诗浅谈〉。有关“和陶诗”的主题研究有朱小枝〈贬谪人生中的田园——论苏轼和陶诗中的田园诗〉。以上学者们的论文研究，皆有论及“和陶诗研究”，“苏轼与陶渊明诗作的对话联系”，“作和陶诗缘由”，“陶与苏之间的比较”，“苏轼的‘和陶诗’风格”，“苏轼和陶诗——人生态度、精神超越”等等。总括以上列举的参考材料，有关苏轼“和陶诗”的研究甚为广泛，而苏轼晚年岭南事迹各时期的“和陶”作品则可以延伸探讨。据上而论，本文以参考学者们之立论观点作为本文研究的基础，进一步窥探“和陶诗”的作品思想以及创作目的，以理解苏轼如何在困顿的晚年生活中，找到珍贵的生存价值。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章节安排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文本比较、文献互证与文献互补的方法进行论文研究。

一、文本细读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有关苏轼晚年时期与“和陶诗”的内在关系，再进一步以张志烈等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来理解“和陶诗”的内容、注释以及后人评论，以此具体辨析文本的思想内涵以及作者的内心想法。美国学者宇文所安（1996）认为：“一个地方主要是通过文本以它们程式化的意象而被知晓、被记住并成为值得追忆的。这些文本并没有引起那些应属于一个地方本身的事件；但尽管不同种类的文本可能会为谁是一个地方“真实”的历史而竞争，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是由文本而非直接由事件构成的。文本中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选择和强有力的意象构成了对后来的时代而言的历史。勇敢的死亡、英雄的行动和值得追忆的情景常常完全被忘却。同时，次要的、不可靠的、甚至是虚构的事件，却通过强有力的文本，成了真正的

历史。一个好的故事，一个人的传说，人们眼前的自然界的证据往往不过是从中选择要素以证实和比拟熟悉作品的细节堆砌。苏轼，在错误的赤壁哪里，做了一首追忆赤壁大战的赋；但只要他认为那个地方就是赤壁，那么他的错误就并不重要。价值——欣赏的叹息、敬畏的战栗、回忆的泪水——是我们赋予一个地点的某种东西”（140）。

艾朗诺（2013）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提及：“苏轼在每首词的序中都交代了写作的场景，说明了时间、地点，所寄和人。在这之前，词与作者之间往往没有密切关联，词的主题比较泛化，几乎不涉及作者的私人情感。他的特点就是强烈的个人色彩，他所要表达的，是某个具体的人独特的生活体认与情感，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211-212）。

本文得到以上作者的启发，於本文开拓有关苏轼晚年贬谪岭南时期及其文本“和陶诗”之间的关系，以多数“和陶诗”所反映作者的生活经历与面貌，作为本文研究的主旨；同时比较苏轼惠州与海南时期的“和陶诗”思想内容，兼以苏诗、陶诗之间的比较课题作为主要论述。因此，笔者先以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的背景考察作为开端，以此延伸苏轼作“和陶诗”的整体研究，探讨作者的择陶过程以至心态上是如何超越前人（陶渊明）。苏轼视陶渊明为心目中的精神寄托，故见苏轼“和陶”的重要性及其研究价值之所在。苏轼与陶渊明的不同之处，比如陶渊明处于隐居时段而作《饮酒诗》，而苏轼则在外任时期作《和陶饮酒诗》，因此苏、陶两者皆可进行深入的比较与探讨。

二、文本比较

严绍盪在〈比较文学论文写作的基础与规范〉提出：“人们在观念上认为的‘比较’，就是‘对比’的意思。这里指将两个物体或者几个物体放在一块，讨论它们的异同优劣。因此，以这样的方式理解‘比较文学’，便是把这方面的学科解释成‘对比（各种文学）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中关于‘比较’的意义，是指将‘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部关系，以此进一步认识其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以及方法论。苏轼於

“和陶诗”均有反映其生活写照，而并无一味以陶渊明之酒杯，以浇自我之块垒。透过“比较”的论文研究方法，本文认为苏、陶两者之别，可以从苏轼能“陶所能”，而又不止於“陶所能”的情况进行辨析，以此对照苏轼与陶渊明“生产”诗作的背景与处境的不同，进一步探讨“和陶诗”的内容价值”（严绍璁，2005：551）。

三、文献互证

文献互证是通过不同文献对相同人物，抑或相同事迹的记叙方式，进行了一次相互发明印证。这是意即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文献同时被提起，继而传达着一个讯息：一个人、一件事在某段时期有着一定程度的真实性、重要性和代表性。透过文献互证的方法，将很大程度地帮助笔者确立一些基本可靠的事迹，并以此建构出全文论述的骨干。本文“苏轼晚年岭南时期及其“和陶诗”之研究”，需要现有文献之辅助，并且再进一步印证历史的事实以及全貌的当儿，以期达到本文所提出的论点，得到完善的证明。透过此一可靠的文献证明以及基础，寻求论文的架构与骨干以达致稳当的印证，以期得到笔者预想中的论文内容。苏轼所作的“和陶诗”，还需可靠以及可信的史料文献作为辅助，如后人为《苏轼诗集》所作的注，抑或后人评苏轼“和陶诗”的论述，又或者宋代文人对苏轼创作的看法与评述，方能进一步剖析苏轼作“和陶诗”的内心独白以及创作目的。

四、文献互补

文献互补方面，由於叙述立场、取材标准、文体特色等因素，苏轼晚年的岭南事迹以及“和陶诗”的评价见於正史者、见于野史者及见于诗文者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遂各自呈现出苏轼“和陶诗”的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如若透过单一类型比如：文学类、史学类、思想类的材料进行深入研究，难免会出现笼统或者缺乏实际之说法，出现了印证“和陶诗”历代以来的评价问题。由于苏轼本身的作品立场抑或自我价值之取向，后人对苏轼“和陶诗”的评述或有偏差，以致主观的评述左右着文献的记载，那么也出现了文献与

作者文本的一些印证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文史哲文献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苏轼的“和陶诗”，以期缩小文献与作品之间的差异，还原作者思想内容，并且全面地剖析苏轼作“和陶诗”的目的。

有关各类文献之叙事方式、取材基准和文体特色，均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熟悉和掌握的条件之下，方能进一步辨析苏轼“和陶诗”及其晚年岭南事迹的研究。笔者透过设想的论点，以期达致苏轼“和陶诗”的研究价值，透过辨析来探讨苏轼作“和陶诗”的真正用意。凭着文献的基本辨析，以此为研究基础的出发点，实则给予笔者提供了较为可信的材料，以互补与互证的方式来建立本论文的骨干内容。基于苏轼毕生的文学作品包罗万有，笔者折中选其晚年仕途不达之时，锁定其“和陶诗”的创作，以此为本论文研究的起步以及基础。因此，笔者尝试在有限的文献辅助的前提之下，力求实事求是的印证方法，给予笔者论文的内容架构提供准确性的论断，此为笔者所期盼达致的研究成果与目标。

有关苏轼“和陶诗”的内容研究，是为值得结合苏轼晚年岭南事迹而进行研究。透过分析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的作品作为基础，其实给予笔者提供了一个门槛，让笔者更有把握透过现有的文献材料，进一步扩展至苏轼其它的“和陶诗”，以此作为观照苏轼晚年於岭南一带所遭遇仕途不达的命运，贯彻地展示苏轼临终前的人格思想以及精神向往。透过个案研究，笔者尝试提供一个切入点，为本文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论述辨析方式，填补笔者对于苏轼“和陶诗”创作目的的假设问题，以达成严谨的学术论证为研究的目标。

本文第二章《苏轼晚年“和陶诗”的背景论述》，主要针对苏轼於元祐七年七月（1092年）时所创作的《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尽和陶诗亦始于此”、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被贬至惠州不久决定“尽和陶诗”，以及最后於元符元年（1098年）再贬至儋州时“陶写伊郁”，探讨其晚年作“和陶诗”的缘由以及“和陶”的生活背景。

第三章《以己适陶，以陶适己：苏轼惠州的“择陶心态”》主要以苏轼贬惠事迹（同时对照苏轼诗、文作品）与“和陶诗”创作之关系，进一步分析此时期的“和陶诗”

内容、后人评论以及比较苏、陶晚年事迹与作品，讨论苏轼的“择陶心态”。本章主要探讨苏轼如何在“和陶”表现个人的情感，借陶诗展露自己的内心独白，以此归纳分析苏轼如何将生活写照之本意写於“和陶诗”中。

第四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苏轼远贬海南与“穷途和陶”》主要以苏轼再贬海南，以比较苏轼与陶渊明晚年事迹为基础，从中探索两者在人生的可观之处。本章主要以苏轼惠州与海南“和陶诗”的主题内容进行比较，探讨苏轼不同时期的“和陶”心态所反映之生活态度、思想、处事心态以及晚年心态，总括作者如何借陶渊明来表达人生观。

结语方面，将以苏轼所作“和陶诗”的内容为基础，总括作者如何以“和陶”来涵盖许多不同的人生思想，勾勒其“和陶诗”以及苏、陶诗歌比较的创作意义。最后，总结苏轼经历晚年的岭南生活后，其“和陶诗”作品如何达致高峰以及有所升华，造就其晚年仕途不达的豁达人生。

第二章 苏轼晚年“和陶诗”的背景论述

苏轼晚年仕途不尽人意，由於屡次为党争之故所牵累，故“复以谗请外”，因此先后外任到杭州、颍州、扬州与定州。后来，苏轼因为“讥刺先朝”的罪名而遭遇贬谪惠州的命运，又再贬到蛮荒之地海南，迎来人生重大之打击。苏轼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曾自叹“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2009：1402）。苏轼於元祐外任扬州时期便开始“和陶”，直到绍圣贬居惠州与海南皆有和陶诗作，其慕陶心态可谓意犹未尽。苏轼曾告知其弟苏辙曰：“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苏辙，2009：

1401)，至贬谪海南“随行有《陶渊明集》”与“常置左右”（苏轼，2010：6064）。苏轼在惠州与海南时期多次以“和陶”方式记录其晚年的生活经历，籍此视作“晚喜陶渊明”之主因。黄庭坚（2011）在《跋子瞻和陶渊明诗》描述苏轼贬谪惠州之情况为：“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1059）。陆游曾在《跋坡谷帖》形容苏轼在岭南时期喜爱阅读陶渊明的作品，而学者袁行霈（2003）论述：“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分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149）。张宏生（2001）曰：“由于和陶诗写於扬州和惠州、儋州两个时期，这期间苏轼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以两个阶段自然划界，他的和陶诗也呈现出不同特色”（31-32）。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以下三个课题：（一）扬州“和陶之始”、（二）惠州“尽和陶诗”与（三）海南“陶写伊郁”。本文据此推断，苏轼和陶背景始发於扬州时期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尽和陶诗”与其晚年岭南事迹的关系密切。本文以扬州与惠州和儋州为界，分析苏轼於惠州与海南时期大量创作“和陶诗”的现象，以此窥探其和陶背景。

第一节 扬州“和陶之始”

苏轼於元祐四年（1089）因为“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因此“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元祐六年（1091），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脱脱，1997：10812-10814）。

《三苏年谱》记载苏轼的仕途情况：“元祐六年八月二日，侍御史贾易论苏轼元丰八年五月一日扬州题诗意存不善，后因执政吕大防、刘摯等论奏延和殿前，拟苏轼、贾易两罢。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孔凡礼，2004：2275）。可见，苏轼晚年仕途不尽人意。

苏轼抵达扬州不久便以治理扬州政事为重，其《扬州谢到任表二首》之一论述：“支郡养痍，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屡玷恩荣，实深惭

汗。伏念臣早缘窃禄，稍习治民”，“乃眷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邻封二浙，饥疫相薰；积欠十年，丰凶皆病”（苏轼，2010：2730-2731）。此表反映苏轼忠心朝廷以及关心民间疾苦³，故有此苦谏之意。元祐七年七月，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为和陶之始。王水照将苏轼一生概括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次大循环，以此为主干以叙述他的生平。本文针对苏轼“第二次大循环”外任扬州“和陶之始”，作为其“和陶诗”的时代背景以进行研究。

苏轼（2010）曾经在《自题金山画像》总结他的一生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5573）。此文所指之惠州与儋州，为苏轼人生“第二次大循环”时的贬居之地，同样也是其晚年大量创作⁴“和陶诗”的时期。本文主题“苏轼晚年岭南时期（绍圣元年～元符三年，1094-1100）及其‘和陶诗’之研究”所指之“岭南”⁵，自隋唐以来多是朝廷官员的贬谪之地。唐代刘恂（1988）在《岭表录异》记曰：“岭表或见物自空而下，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之家性惨害也”（1）。唐代魏征（1973）在《隋书》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

³ 王水照在《苏轼评传》论述有关苏轼为民请命的政治理念，可参阅之。（王水照，2004：112-113）

⁴ 苏轼作“和陶诗”与“岭南文化”不无关系。刘圣宜在《岭南近代文化论稿》之“岭南文学论析”一文提及，人们对“文化”的一个共识，从广义而言，这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而言，这可以解释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的结构。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分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在岭南的延伸；以时代性来说，岭南文化可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等时段。宋代以前，唐代大诗人韩愈被流放到岭南，先贬为阳山县令，再贬为潮州刺史，所到之地受到人们长久的崇拜”。（刘圣宜，2007：3-7）

⁵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輿地考九》考究“岭南”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瓯越、闽越，禹後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非其种也，故《輿地志》云，东南有二越，其义详矣。或曰自交趾至於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故不得尽云少康後），古谓之雕题。（马端临，1986：2539）郑芳祥在《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提出有关苏轼岭南时期的研究，历来诸多学者专家皆有进行相关论述。（郑芳祥，2006：12）北宋时期的大庾岭，位於江南西路与广南东路的交界处，设有大庾县，即今广东省大於县；另外参考《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1982：34-35）有关苏轼於宋代贬谪之“惠州”与“海南”的文献记载，详阅《宋朝方志考》。（顾宏义，2010：2010）

多瘴疠，人尤夭折”以及“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887、1735）。宋代王象之（2012）於《輿地纪胜》引沈晦诗曰：“五岭炎热地，从来著逐臣”（2477）。

南宋周去非（1999）在《岭外代答》论述：“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丘，高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11）。苏轼（2003）在《东坡志林》同样深刻描述其身处岭南时期的感受曰：“天气卑陋，气蒸溽，而海南尤甚，秋夏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以能久？”（161）

根据上文的“岭南”记述，它离中原偏远，在唐宋时期被人视作“逐臣”、“瘴疠”、“天气卑陋”与“何以能久”之地，因此苏轼的晚年苦况可见一斑。根据清代王文诰统计，苏轼“和陶诗”达一百二十四首⁶，其中二十首为外任扬州时期所作，较之其贬谪惠州与海南所作的数量甚少，仅占整体“和陶诗”大约六分之一。苏轼於扬州、惠州与海南所作“和陶诗”的数量如下表：

⁶ 金甫曝在博士论文《苏轼“和陶诗”研究》提出，苏轼“和陶诗”的具体数目尚没定论。学术界大多跟从王文诰“共一百二十四首”说法，王氏的说法仍有矛盾之处（金甫曝，2008：18-19）。本文受刘尚荣在《宋刊〈东坡和陶诗〉略说》所启发，其曰按各种苏轼诗集所收“和陶诗”的数量，粗看颇不一致，实际上无大差别。苏轼的“和陶诗”有数可查，各家各收，分合不同，编次有别，但内容和篇目并无增减。清代学者在此问题上互相矛盾的说法，把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得十分混乱，今有澄清的必要。苏轼晚喜读陶渊明诗，也曾有过“尽和其诗”的写作计划，但并未实现。（刘尚荣，2004：457-458）另外，王文诰在《苏诗研究史稿》认为《苏轼诗集》所注之资料翔实，注重苏诗文系年。本文所引苏轼诸“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皆参考《苏轼诗集》。

仕途状况	时间	“和陶诗”作品	首
外任扬州	• 元祐七年（1092），寻改扬州，三月到任至七月，内调为兵部尚书，充南郊卤簿使。（约五个月）	《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	20
贬谪惠州	• 绍圣元年（1094），六月时，因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而授命惠州安置。十月抵达惠州。贬谪时间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约两年七个月）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	6
		《和陶贫士七首》并引	7
		《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并引	1
		《和陶读山海经》并引	13
		《和陶咏二疏》	1
		《和陶咏三良》	1
		《和陶咏荆轲》	1
		《和陶移居二首》并引	2
		《和陶桃花源》并引	1
		《和陶乞食》	1
		《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1
		《和陶酬刘采桑》	1
		《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引	1
		《和陶时运四首》并引*	4
《和陶庞参军六首》并引*	6		

仕途状况	时间	“和陶诗”作品	首
贬谪儋州	• 绍圣四年（1097）二月，苏轼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贬谪昌化军时间自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二月。（约两年八个月）	《和陶止酒》并引	1
		《和陶还旧居》	1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并引	2
		《和陶示周掾祖谢》	1
		《和陶劝农六首》并引*	6
		《和陶赴假江陵夜行》	1
		《和陶九日闲居》并引	1
		《和陶拟古九首》	9
		《和陶东方有一士》	1
		《和陶停云四首》并引*	4
		《和陶怨诗示庞邓》	1
		《和陶杂诗十一首》	11
		《和陶田舍始终春怀古二首》并引	2
		《和陶赠羊长史》并引	1
		《和陶形赠影》	1
		《和陶影答形》	1
		《和陶神释》	1
		《和陶使都经钱溪》	1
		《和陶和刘柴桑》	1
		《和陶西田穫早稻》并引	1
		《和陶下濂田舍穫》	1
		《和陶戴主簿》	1
		《和陶游斜川》	1
《和陶与殷晋安别》	1		
《和陶王抚军座送客》	1		
《和陶答庞参军》*	1		
《和陶郭主簿二首》并引	2		
《和陶始经曲阿》	1		
		总数	124

表一：苏轼外任扬州，贬居惠州与儋州所作“和陶诗”之数量

*作於惠州或儋州与作诗系年待考证

根据上表显示，苏轼外任扬州历时有五个月，“和陶诗”计有二十首；贬居惠州历时有两年七个月，“和陶诗”计有四十七首；贬居海南约历时有

两年八个月，“和陶诗”计有五十七首；而“和陶诗”於此三地总共有一百二十四首。另外，可参照李剑锋在《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所根据清代王文浩所编《苏轼诗集》，对苏轼生平的诗作数量进行的统计结果：

纪年	诗数量	与陶相关的“诗”数量	与陶相关的“文”数量	与陶相关的“词”数量	生平事迹/大事（略举）	陶渊明接受时期	生活与仕途经历/循环
1059 - 1079	卷一至卷十九 (1006首)	38	-	-	• 1079 乌台诗案	• 苏轼接受陶渊明的始发期	在朝/外任
1079 - 1085	卷二十至二十六 (387首)	25	3	4	• 黄州之贬	• 苏轼接受陶渊明的骤转期	贬居
1085 - 1093	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六 (507首)	32	-	-	• 1086 元祐更化 • 1092 扬州外任 • 1093 妻王闰之去世	• 苏轼接受陶渊明的回旋期	在朝/外任
1094 - 1101	卷三十七至四十五 (410首)	160 • “和陶诗”-47题 124首 • 提跋、书信、词作 10多处			• 贬谪海南 • 1096 妾王朝云去世 • 1101 北归途中，卒於常州	• 苏轼接受陶渊明的高潮期	贬居

表二：苏轼生平“与陶相关之诗、文、词作”数量一览。（摘自李剑锋（2002a），《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页282。）

苏轼岭南、海南诗作约有410首，而与陶渊明有关诗作多达160首。自绍圣元年（1094）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约七年间，平均每年写作23首与陶有关的诗，为苏轼生平以及与陶有关诗作数量与比例的高峰。此时期“和陶诗”有44题113首，另有《归去来集字十首》、《和陶归去来兮辞》

(1首)，合计共有47题124首，有关陶渊明的提拔、书信、词作等尚有10多处，反映苏轼对陶渊明的极度重视。苏轼在岭南、海南期间与陶渊明取得了强烈的共鸣，是为苏轼接受陶渊明的高潮期。

苏轼(2010)於外任扬州时期以“师范渊明”为主要的精神寄托，以完成《和陶饮酒二十首》⁷，其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序》自述：“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馀。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3974)。苏轼於此诗序表达了效仿陶渊明饮酒的乐趣，在“醉”与“醒”之间保持“闲适”的姿态看待生活。苏轼不仅心之慕陶，也将“和陶诗”展示予其弟子由与晁无咎欣赏，分享文学创作。⁸

后世评论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的看法各有不同⁹，诚如王直方(2012)在《王直方诗话》曰：“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田园》六首，乃至渊明无异”(4016)。纪昀《纪评苏诗》卷三五曰：“敛才就陶，而时时亦自露本色¹⁰”(4016)。苏轼因为“如己所

⁷ 本文的研究焦点为苏轼扬州“和陶之始”的背景，本人曾於拙文〈苏轼和陶饮酒诗中的“苏意”〉进行《和陶饮酒二十首》的主题内容与各家评论的分析。(陈润隆，2016：197-216)

⁸ 根据王水照分析，苏轼在扬州除了进行公务，也常进行文学活动。另外，杨胜宽认为与苏轼处於同一时代的文人——“苏门四学士”其中一员晁补之，也欣赏陶渊明为人，并作《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杨胜宽，2010：337-341)《宋史》载有“苏门四学士”的论述，曰：“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下，天下称为四学士，而庭坚于文章尤长于诗，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脱脱，1997：13110)《宋史》有记载晁补之生平，其字无咎，济州钜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恂之曾孙也。父端友，工於诗。补之聪敏强记，才解事即善属文，王安国一见奇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稔钱塘山川风物之丽，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於世，由是知名。(脱脱，1997：13111)

⁹ 王启鹏在《苏轼文艺美论》认为苏轼在扬州任太守时，其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的开篇第一首就写道：“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云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句，唯妙唯肖地写出了诗人的生活态度：摆脱世俗的羁绊，忙里偷闲，显示出一种闲情逸志。(王启鹏，2007：96)

¹⁰ 黄伟伦在〈论苏轼和陶诗中的“本色”意义〉分析了苏轼《和陶诗》中的“本色”意义，可详阅之。(黄伟伦，2003：35-47)

作”而“和陶”，在创作手法与陶渊明“无异”，诗作也有“本色”之意，可见苏轼效仿陶渊明以及对“和陶诗”的重视。元祐七年（1092）四月，苏轼（2010）作《和陶饮酒二十首》三个月前曾在《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一词谈论“酒”¹¹带给他的乐趣，诗云：“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668）。

元祐七年七月，苏轼於汴京“听武道士弹贺若，作诗赠之”（孔凡礼，2004：2291）。其《听武道士弹贺若》云：“琴里若能知贺若，诗中定合爱陶潜”（苏轼，2010：3723）。元祐六年（1091）八月至元祐七年（1092）二月间，苏轼（2010）颍州作《录陶渊明诗》谈论陶渊明确：“言发於心而冲於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7555）。

苏轼在《录陶渊明诗》与《听武道士弹贺若》同样表达对陶渊明的欣赏，以及向往田家的平淡¹²生活。除了以上两首诗歌，类似的心情也见於《欧阳叔弼见访诵陶渊明事叹其绝识叔弼既去感慨不已而赋此诗》：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
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云何元相国，
万钟不满欲。胡椒铤两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杀其身，何啻
抵鹊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苏轼，2010：3813）

¹¹ 王守国在《酒文化中的中国人》认为酒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异常丰富，酒的发展史与经济发展史休戚与共，那么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酒的作用则异常广泛，酒文化史与社政治史、审美思潮史、文学艺术史等息息相关。（王守国，1990：11-20）相关成果研究，可详阅金准锡在《中国古代饮酒诗研究》的研究。（金准锡，2016：126-145）以及林红在《苏轼与酒及涉酒诗研究》的论述。（林红，2016：67-70）

¹² 程杰认为，考诸整个宋代，求于陶渊明风调相续，同道相契，屈指便属苏轼。苏轼《录陶渊明诗》所提及“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正是品格妙识上的高度吻合，而其学陶和陶也最为会“意”得“真”把“平淡”诗风与陶渊明紧密相联，标志了“平淡”诗观的成熟，详阅《宋诗学导论》。（程杰，1999，98-100）

以上诗歌赞颂了陶渊明的高尚品格，不为世事所累。诚如苏轼（2010）於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四日，其於《书李简夫诗集后》曰：“陶渊明欲士则士，不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平生不眩於声利，不戚於穷约，安於所遇而乐之终身者”以及“庶几乎渊明之真也”（7681-7682）。苏辙赞同兄长苏轼对於陶渊明的欣赏，其《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便有描述苏轼在仕途的困境以及寄托陶渊明的心态：

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馀年，
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
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苏辙，2009：1402）

在苏轼贬谪黄州的时候，其《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曰：“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南望亭丘，斜川当日境”，宋人傅藻对此注曰“世人於梦中颠倒，醉中昏迷。而能在梦而了，在醉而醒者，非公与渊明之徒，其谁能哉！”（苏轼，2010：344）苏轼在以上词句表达其向往躬耕的简单生活，对於陶渊明的欣赏心态何其坚定。

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其作《书渊明饮酒诗后》曾曰：“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此许多事。元丰五年三月三日，子瞻与客饮酒，客令书此诗，因题其后（苏轼，2010：7492）。此外，苏轼也於元丰七年（1084）於《陶渊明诗》一文曰：“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远相保。觞弦肆朝日，尊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苏轼，2010：8727）。

苏轼在以上两首诗歌除了提及陶渊明以及“酒”之外，也提供苏轼看待人生与生活的思考空间。可见，苏轼在外任扬州之前，其作品中的“慕陶心态”早已有之。曾枣庄、吴洪泽在《宋代文学编年史》论曰：

苏轼本来就豪放和平淡两种风格，他从黄州开始追求平淡风格，

晚年有意学陶，都是他前期慕陶，追求平淡诗风的继续发展。

（吴洪泽，2010：949）

苏轼黄州时期已有意学陶，而“前期学陶”为苏轼作“和陶诗”前的“慕陶”¹³经过。因此，苏轼“和陶”与“慕陶”之间便有渊源可追溯。此外，苏轼在《评韩柳诗》也有对陶渊明的诗歌提出己见：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苏轼，2010：7549）

苏轼认为陶诗在“平淡风格”的表现突出，故借“如人食蜜”之“中边皆甜”形容陶诗，其看似平淡又流露“似淡而实美”的诗作美感。高云鹏（2008）在〈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曾对“平淡”作出研究与提出详尽的解释曰：“平淡”，是指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种艺术风格。“平淡”风格早已有之，其风格的盛行，以及相关的美学理论，在宋代的时候已经大量涌现（74）。为此，高云鹏也有作出相关的总结：

“平淡”是宋代诗歌美学的核心概念，苏轼在欧阳修、梅尧臣之后论及“枯淡”的平淡理论。苏轼的“枯淡”论以“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为基本内涵。

“东坡和陶诗”的作为行为艺术，体现苏轼对被理解、被认同

¹³ 有关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前的“慕陶”经过，详阅本人拙文〈苏轼和陶饮酒诗中的“苏意”〉的论述。（陈润隆，2016：204-208）详见杨胜宽在《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对苏轼的慕陶渊源所进行的考察。（杨胜宽，2010：140-148）另参考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所论及苏轼的“慕陶”经过。（曾枣庄、吴洪泽，2010：947-950）

的渴望。（高云鹏，2008：81）

苏辙回忆苏轼作“和陶诗”的缘由，曾有进一步说明苏轼喜爱陶渊明的为人以及诗歌，所以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其《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有云：

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几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龟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2009：1402）

日本学者内山精也（2005）在《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考究苏轼次韵诗认为：“‘和陶诗’是苏轼文学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作品。从苏轼次韵诗的全体来看，它是某种共同的目的意识下连续创作的，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次韵诗”（358）。在苏轼的“和陶诗”中，除了《和陶饮酒二十首》作於扬州时期以外，其余都是作於晚年谪居岭南时期。不难推想，苏轼想要通过对自己尊敬的渊明诗的次韵之作，来达到使身处偏远之地、从被埋没的自己振作起来的“对自己的目的”。与此同时，也存在借助

次韵之作对同时代的诗人显示自己健在的姿态的“对他人的目的”（373）。透过苏轼与陶渊明的隔空对话，苏、陶诗歌也同时得到升华，让后世理解苏轼对於陶渊明的重视，重新确立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

学者薛天纬（2009）在〈师范渊明，唯取一适——苏轼为什么要写和陶诗〉一篇解释：“写作和陶诗贯穿了苏轼整个晚年，诗以直白、写实或内省的笔法携程，是他在人生最后一个时期生活景况与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循着苏轼晚年的足迹，其《和陶诗》写作自然地分成了三个时期¹⁴”（66）。薛天纬在梳理苏轼晚年不同时期所作“和陶诗”颇为仔细，包括分类“和陶诗”为“直白”、“写实”等。此论文可以多加提及苏轼於各个时期（扬州、惠州与海南时期）之“和陶”与其生活的关系，加之后人对“和陶诗”的评论。苏轼於外任扬州前的“慕陶心态”，从“早已有之”推进至“继续发展”，掀开了“扬州和陶之始”的创作历程。

第二节 惠州“尽和陶诗”

宣仁后於元祐八年（1093年）去世，后来哲宗便亲自处理政事¹⁵。苏轼外任¹⁶，并且以两学士出知定州的职位。苏轼前往定州前，欲入见辞别哲宗

¹⁴ 薛天纬於〈师范渊明，唯取一适——苏轼为什么要写和陶诗〉以三个时期论述苏轼晚年作和陶诗，各别为知扬州时期、惠州安置时期与居海南时期。此论文启发笔者针对苏轼晚年贬谪岭南事迹与和陶诗研究的思考，下文进一步探讨。

¹⁵ 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吕大防、范纯仁等问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託，同官家御殿听断。卿等试言，九年间曾施恩高氏否？只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没后，比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赐社饭，曰：“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太后听政，召用故老名臣，罢废新法苛政，於是宇内復安。辽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场，曰：“南朝尽行仁宗之政矣。”临朝九年，朝廷清明，华夏餗定，力行故事，抑绝外家私恩，人以为尧、舜”。（陈邦瞻，1997：1397）随着年龄渐长，宋哲宗对祖母及元祐大臣的不满越甚，高后一死，亲掌大权的哲宗便要发泄他的积愤。他不满元祐大臣，因此打算起用新党，名义称说继承父志，励精图治。（王水照，2004：113）

¹⁶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同听政。司马光援引熙宁、元丰间受到排斥和贬逐的臣僚（旧党成员包括苏轼、苏辙、郑侠、王巩、范纯仁、秦观、晁补之等人），由此揭开元祐时期旧党初返朝廷、新党初逐在外的历程。自元祐四年至八年，苏轼先后出守杭、颍、扬、定四州，虽以补外居其半，元祐仍是苏轼一生最为顺利、显赫的一段

却被拒绝於外，只好上奏《朝辞赴定州论事状》曰：“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苏轼，2010：3588-3589）。即使哲宗拒绝面见苏轼，然而苏轼却依然劝谏哲宗用心从政，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关心以及忠心。

绍圣元年（1094），苏轼（2010）在《赴英州乞舟行状》曰：“窃伏思念得罪以来，三改谪命，圣恩保全，终付一郡”、“毕馀生于治所，虽以瘴疠死于岭表，亦所甘心”（3641-3642）。苏轼自知官职被降，然而却没有表达怨言，其《三苏年谱》记载：“四月壬子，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同日，范纯仁上疏乞贷苏轼。不听。时宰有加害意”（孔凡礼 2004:2561）、“闰四月三日，除命下，轼罢定州任，责知英州”（孔凡礼，2004:2566）。

《宋史》本传记载：“绍圣初（1094年），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刺先朝¹⁷。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¹⁸，惠州安置（脱脱，1997：10816）。苏轼原本认为自求外任扬州之

时光，与遂后贬谪惠州与海南之困境不同。苏轼遂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且御史不断弹劾他，连求外任定州。苏轼在颖、扬二州不过半年光景，於元祐七年九月召回汴京，官至进官端明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官位。绍圣元年（1094）后，苏轼被贬往、英州、惠州、儋州等地，其他集团成员纷纷被贬蛮荒之地，元祐文人集团进入逐渐衰落之阶段。本文旨探讨苏轼晚年岭南事迹，萧庆伟在《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解释北宋元祐时期新旧党争以及学术界对苏轼元祐仕途的影响，颇有论述。（萧庆伟，2001：116）另参考薛颖在《元祐文人集团与元祐体》所论及苏轼於元祐时期所进行的文学活动。（薛颖，2009：48）

¹⁷ 郑芳祥认为所谓“讥斥先朝”的文字，其实早就为其他人所再三断章取义、刻意曲解。（郑芳祥，2006：24）

¹⁸ 据《宋史》曰：“宋初无所掌，其事务悉归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亦无定员。恩数与执政同。初除，锁院降麻，其礼尤异，以待宗室近属、外戚、国婚年劳久次者。若外任，除殿帅始授此官，亦止於一员；或有功勋显著，任帅守于外，及前宰执拜者，尤不轻授。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待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至是，皆南省奉行，而开府不预”。（脱脱，1997：3946）据《文献通考》，“唐因隋制，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後改大总管为大都督。永徽已後，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者即不是节度使。景云二年，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使，自此有节度之号。节度使封郡王，则有奏记一人；兼观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抚

后，借此远避朝廷纷争，但在哲宗亲政后即面对“惠州安置”的贬谪命运。苏轼只好携带幼子苏过与侍妾王朝云远赴惠州¹⁹，其经历也在《与陈季常十六首》其十六有所记述，文曰：“到惠州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苏轼，2010：5889）。苏轼在惠州度过了半年时光，既没有难以适应“风土食物”的问题，又得到人民的款待以及爱戴。黄庭坚（2011）在《跋子瞻和陶渊明诗》描述苏轼贬谪惠州时的情形为：“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1059）。苏辙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回忆苏轼贬居惠州的经过云：

时方例废旧人，公坐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
诬以谤訕。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
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苏辙，2009：1420）

苏辙对苏轼的生活情况也作出以下的描述：

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蜒所侮，
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若者畀之药，
陨毙者纳、之窆。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
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苏辙，2009：1420-1421）

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度支、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秣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马端临，1986：537）

¹⁹ 惠州南汉以循州归善县置禋州，以归善、海丰、博罗、河源四县来属。宋天禧五年，以州名犯仁宗御名，改为惠州，属广东路。宣和二年，赐郡名博罗。（马端临，1986：2541）

苏轼面对“讥刺先朝”、“三改谪命”、“诬以谤讟”、“寻复降一官”、“时宰欲杀之”种种厄运，却豁达表示“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学者张宏生在《宋诗：融通与开拓》认为：

对于苏轼早年来说，他强烈的用世之心和隐逸并不构成任何实际的矛盾。可是谈到他的和陶诗的主要部分，即晚年南迁后所写的那一部分时，就不能简单地这样看了。因为它们是在苏轼经历了人生的许多磨难之后写出来的，显然更加接近作者的生活。当然，我们还应当注意，由于和陶诗写於扬州和惠州、儋州两个时期，这期间苏轼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以两个阶段自然划界，他的和陶诗也呈现出不同特色。（张宏生，2001：31-32）

张宏生指出的“和陶诗显然更加接近作者的生活”与苏轼贬居惠州后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轼作“和陶诗”时常有说明作诗²⁰目的，如其《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的诗引便交代了外游惠州白水山佛迹寺的情景，诗引曰：“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於汤泉，晞发於悬瀑之下，浩歌而归”（苏轼，2010：4509）。此外，苏轼也在此诗引论述其听闻儿子苏过朗诵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六首，其回想自己在扬州曾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因此决定继续进行“和陶诗”的创作。

²⁰ 历代逐臣常见的那种忠而被谤、无辜见弃的愤懑屈辱，前途无望、生命沦落的哀伤恐惧，对故乡、故国的眷恋，对人生命运的低沉思索，都纷纷现在诗作中。随着谪居时日的延伸，这种愤懑日益增强，郁结於胸，不吐不快，御史以诗歌宣泄苦闷，控诉命运的不公，便形成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尚永亮，2007：152）。另外，有关宋代文人官人被贬谪到岭南的情况，学界也有给予相关的研究。金强（2004）在博士论文《宋代岭南谪宦研究》把宋代岭南的地域、谪宦心态、谪宦的活动、谪宦对岭南社会发展的影响皆有相关研究与论述。

继元祐七年七月，苏轼外任扬州始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时隔两年八个月后又“尽和陶诗”，以“其诗乃己耳”。此后，可见苏轼的“和陶诗”经常反映²¹惠州的生活情况，如《和陶贫士七首》诗引云：“余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与“重九伊尔，樽俎萧然”（苏轼，2010：4598）。此外，苏轼在《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诗引云：“十月初吉，菊始开，乃与客作重九，因次韵渊明一首”（4598）。绍圣二年（1095）初冬至绍圣三年（1096）正月，苏轼也有陆续创作与其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和陶诗”，如《和陶读山海经》、《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与《和陶桃花源》。

苏轼笔下“和陶诗”也有写过比较具体的生活情节，如《和陶移居二首》诗引云：“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迨今一年，多病鲜欢，颇怀水东之乐。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父老云：此古白鹤观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诗”（苏轼，2010：4737）。苏轼於此诗指其喜爱白鹤观，有意迁居於此。苏轼在《食荔枝二首》也有同样的诗句表现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2010：4744）。《三苏年谱》记载：“白鹤峰新居欲成，轼夜过西邻逢亨秀才，作诗抒安於惠之意”，“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尽乃得泉，轼有诗。新居上梁，作《上梁文》，有终焉之意”（孔凡礼，2004：2722-2726）。最后，苏轼在白鹤峰的新居建成之后，便从嘉祐寺迁入居住。从“和陶诗”的诗句来看，不难发现苏轼喜爱惠州的心情以及萌生“终焉惠州”的想法。苏轼惠州新居建成之后，於贬谪仕途中仍然有机会与阔别三年的儿孙重逢，听闻孩子苏迈到访便欣喜在《和陶时运四首》的诗引当中描述：

²¹ 后世对苏轼《和陶乞食》、《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与《和陶酬刘采桑》的创作时间看法不一。清代王文诰於《苏诗总案》编《和陶乞食》为惠州所作，认为“此首与《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与海外年荒米缺，时有匮乏之忧，甚至於学龟息以不食，与《乞食》诗‘幸有馀薪米，养此老不才’句不合”，而查慎行编《和陶乞食》为海外所作。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咏渊明《时运》诗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庐。”似为余发也。乃此其韵。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馀，不能无欣然。（苏轼，2010：4712）

苏轼也借友人吴復古、陆惟忠偶尔的拜访，反映其贫居的生活情况，如其《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诗引云：“酒尽米尽，取米欲酿，米亦竭。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於余。因读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苏轼，2010：4789）。苏轼在《和陶庞参军六首》的诗引中也提及其与友人周彦质的一段交往记录：

周循州彦质，在郡二年，书问无虚日。罢归无虚日。罢归过惠，
为余留半月，既别，和此诗追送之。（苏轼，2010：4823）

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朝云病卒。轼有诗、词悼之（孔凡礼，2004：2707）。苏轼（2010）在《惠州荐朝云疏》忆述亡妾王朝云：“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诟病而亡”（6864）。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四〇）认为：“悼朝云也”，乃绍圣三年（1096）十月作《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於惠州。其云：《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以长春花与比，与梅花词同一感悼。故云“谁言此弱质”，“短句馀清悲”也。孔凡礼以为元符元年岁末作於儋州（见《苏轼年谱》卷三七）²²。后世对苏轼作《和陶酬刘柴桑》之系年也有不同说法。王文诰在《苏诗总案》卷四十认为此诗为绍圣三年（1096）十二月，作於惠州，其云：“《酬刘柴桑》诗，乃白鹤新居蒔植之作，当改编丙子。彼（案，指《和陶刘柴桑》）则经况瘁，此则从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诗之气味，亦绝不类也。又《酬刘柴桑》有“穷冬出甕盎”句，与林抃送花木事相合，当作於此时也”；而孔凡礼则

²² 对照两家说法，王文诰有论及苏轼作《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於惠州的观点，而不见孔凡礼补充苏轼作於儋州的说法。本文尚依王文诰所编为根据，定为作於惠州。

认为此“和陶诗”为元符元年（1098）岁末（见《苏轼年谱》卷三七），作於儋州。承上所论，下表分别记录与苏轼惠州生活相关与无关之“和陶诗”数量：

类别 “和陶诗” 纪年/苏轼年龄	与苏轼惠州生活相关	与苏轼惠州生活无关
绍圣二年（1095） /苏轼六十岁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和陶贫士七首》、《和陶 己酉岁九月九日》	《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
绍圣三年（1096） /苏轼六十一岁	《和陶移居二首》、《和陶 岁暮张常侍》、《和陶和胡 西曹示顾贼曹》*	《和陶咏二疏》、《和陶咏 三良》、《和陶咏荆轲》、 《和陶桃花源》、《和陶酬 刘柴桑》*
绍圣四年（1097） /苏轼六十二岁	《和陶答庞参军六首》、 《和陶时运四首》	
无系年（待考证）	-	《和陶乞食》
篇/首总计	八篇/二十八首	七篇/十九首

表三：与苏轼惠州生活相关/无关之“和陶诗”

*作于惠州或儋州与作诗系年待考证

苏轼於惠州所作“和陶诗”计有十五篇/四十七首；与苏轼生活相关之“和陶诗”，有《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和陶贫士七首》、《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和陶移居二首》、《和陶岁暮张常侍》、《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和陶答庞参军六首》、《和陶时运二首》，八篇/二十八首；与苏轼生活无关之“和陶诗”，有《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和陶桃花源》、《和陶酬刘采桑》和《和陶乞食》，共七篇/十九首；有待考证的“和陶诗”系年，仅有《和陶乞食》一篇/一首。总结以上资料，与苏轼惠州生活相关比无关之“和陶诗”多出一篇/九首。

苏轼外任扬州作一篇/二十首之《和陶饮酒二十首》与贬谪惠州所作十五篇/四十七首的“和陶诗”，两时期在比较之下反映了苏轼不同的“和陶心态”（第三章继续论述）。纵观惠州时期的“和陶”数量，各类的“和陶”内容由苏轼扬州之前的慕陶心态，直到贬谪惠州，其“和陶诗”范围已经扩

大并且更加贴近苏轼的生活面貌，实践其“余在广陵和《饮酒二十首》，今復为此，以尽和其诗乃己耳”的想法。“和陶诗”因此成了苏轼在惠州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让苏轼在忧患仕途再次找到了陶渊明。

第三节 海南“陶写伊郁”

绍圣四年（1097），“甲辰（十九日），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安置”（孔凡礼，2004：2737）。《宋史》本传记载苏轼“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²³，居昌化。昌化，故儋耳²⁴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元符三年（1101年），徽宗立，更三大赦，復朝奉郎²⁵，建中靖国元年，卒於常州”（脱脱，1997：10816-10817）。

苏轼经历惠州之贬，后来再贬海南，仕途命运几经波折，生活起居悲苦至极。苏轼在《与程全父十二首》其九深刻描绘其凄凉的晚景生活，同时论述其遭到迫逐，居无定所。苏轼（2010）也在《与程秀才三首》一文提到：“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6068）。纵使在海南生活条件恶劣，苏轼仍然得到当地人民的协助以度过苦境，因此感到欣慰至极。苏轼贬谪海南再

²³ 据《文献通考》，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故谓之别驾。汉制也，历代皆有（後汉周景为荆河州，辟陈蕃为别驾，蕃不受。景题别驾輿曰“陈仲举座”，不复更辟，蕃惶恐起视。职《烈士传》曰：“孔恂字巨乡，为别驾。别驾，车旧有屏星如刺史车，刺史因怒，欲去别驾车屏星。恂曰：‘彻去屏星，毁国旧仪。别驾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止。”《庾亮集·答郭豫书》云：“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宣王化於万里，其任居刺史之半。”梁时别驾官品，扬州视黄门郎，南徐州视散骑常侍）。隋及唐并为郡官。（马端临，1986：565）

²⁴ 据《文献通考·輿地九》记载，儋州土地与珠崖郡同。汉置儋耳郡。唐置儋州，或为昌化郡。属岭南道。（马端临，1986：2545）另外，唐武德五年（622年）改儋耳郡置，治义伦县（今海南儋州市西北旧儋县）。辖境相当今海南省儋州、昌江、东方等市县地。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昌化军，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儋州。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改为昌化军。南宋端平中改为南宁军。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改南宁军为儋州。1912年，废为儋县。（戴均良，2005：3215）

²⁵ 据《文献通考·职官十八》，朝奉郎，古无此阶。宋元丰更官制，以朝奉郎换左、右司谏及後行员外郎。（马端临，1986：577）

次选择陶渊明，其《与程全父十二首》谈到自己随行携带《陶渊明集》，籍此作为忧患仕途中的精神寄托，以抒发其“陶写伊郁，正赖乎尔”的忧患心情。尽管苏轼於海南的盘缠无几，加上贬居五岭以南的偏远地区，气候与环境极其恶劣，四处瘴疠令人不适，然而阅读陶渊明的著作却成了苏轼的喜好。另外，杨玲在〈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认为：

苏轼《和陶诗》正是为了“陶写伊郁”，排遣自己胸中烦闷及人生困境。他在生存困境中以自己本真的生命全面进入对陶渊明的体验，理解陶渊明与追问中产生对话，陶渊明也从纸质的文字材料中活生生诞生出来，成为与苏轼灵魂交流的朋友，精神慰藉的良师（杨玲，2009：60）。

苏轼在困境中理解陶渊明，将“和陶诗”分别视为其扬州、惠州与海南忧患仕途的中介作用，给其心境与处境带来生活动力以及精神寄托。绍圣四年（1097），苏轼与苏辙二人被朝廷贬谪之后在《和陶止酒》的诗引曰：“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苏轼，2010：4839）。从苏轼在扬州“和陶饮酒”、在惠州“无酒为叹”以及在海南“止酒”，反映三处以三种“借酒”方式与陶渊明进行对话，描写其真实的生活面貌。苏轼也有在《和陶停云四首》的诗引中，提及联系苏辙的艰难，只好以和陶渊明的诗歌《停云》，记述其思念苏辙的心情。

苏轼在海南的生活经历散见于各“和陶诗”中，比如在海南梦见惠州旧居白鹤山而作《和陶还旧居》，以此抒发其喜爱惠州的心情。苏轼在海南的生活困境也在多篇“和陶诗”有所论述，如《和陶连雨独饮二首》诗引云：“‘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然“独有一荷叶杯，工制美妙，留以自娱。’因此乃和渊明《连雨独饮》”（苏轼，2010：4858）。苏轼在《和

陶怨诗示庞邓》更以“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在《和陶使都经钱溪》以“仰看桃榔树”与“相如卖车骑，五畝亦可易”等诗句描写其海南的凄苦生活。苏轼晚年的海南生活不如意，如其遭到迫逐的时候曰：“董必议遣人过儋，赖彭子民劝而止，然苏轼仍被逐出官舍”（孔凡礼，2004：2799）。

尽管苏轼在海南的生活不尽人意，然而却有终老海南的想法。《三苏年谱》记载，苏轼“买曾氏地南污地之侧，起屋五间，客王介石及其他学生为助之。张中亦助之。并手植果实”（孔凡礼，2004：2800）。苏轼（2010）在《和陶和刘柴桑》清楚描述其海南的生活困境，同时刻画当地人民协助其建造房子的画面，诗句云：“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邦君助畚鍤，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4988-4989）。

苏轼在海南游城东学舍，於初秋赋《和陶示周掾祖谢》，诗句如“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欣。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乃指城东学舍，又写“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来感慨其年岁已高，而诗末句则以“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苏轼，2010：4862）论及三国人物虞翻（当时五十馀岁）贬谪交州后讲学，从不感到疲倦，苏轼（苏轼作此诗时已六十馀岁）却因年迈与力不从心而感到惭愧。

苏轼的“和陶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各有不同，其《和陶劝农》描述致力发展海南的想法，劝勉汉民与黎民和睦相处，种树与勤耕劳作，引领人民走向富足生活；其在《和陶赴假江陵夜行》也有运用农家的诗句如“犬吠主人怒，愧此闾里情”描写海南的日常生活；而在《和陶拟古九首》以“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其四）以及“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復采”（其八）等诗句描写海南风土。苏轼於元符元年迁入新居之后就过着农民生活，如其《和陶西田穫早稻》的诗引中题写“小圃栽植渐成，取渊明诗有及草木蔬谷者五篇，次其韵”、《和陶下潞田舍穫》题写“食菜岂不足，呼儿拆鸡栖”

以及《和陶戴主簿》题写“手栽兰与菊，侑我清终宴”的诗句，皆是书写享受栽种之乐以及农民心情的生活写照。

苏轼於惠州作《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与海南作《和陶九日闲居》同样为重阳节期间，后者於诗引论述由於夜晚辗转无法入眠，因此起床饮酒，更以此进行“和陶”之作。苏轼於惠州“重阳和陶”，於海南又“重和陶渊明一篇”，这反映其在两地各别“借陶”以排遣忧患心情的需要。苏轼曾感叹生活上“出无友”的无奈，因此对於友人的拜访感到格外珍惜，如其《和陶杂诗十一首》²⁶其七云：“潮阳隔云海，风晚尚见客”，而其《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的诗引论述：

僮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
访之。居临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予亦欣然
同之。名其屋曰载酒堂，用渊明《始春怀古田舍》韵。（苏
轼，2010：4934）

苏轼不仅广交朋友，对海南子民更是爱护有加，其《和陶赠羊长史》也有提到感谢友人愿意船运书籍借其阅读，因此作诗表示感激（苏轼，2010：4938）。苏轼身在儋州不时与友人张中²⁷保持友好关系，因此分别作了《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与《和陶答庞参军》三次送别友人。张中曾经安置官屋给苏轼居住，不料被罢任调离海南，因此连作三首“和陶诗”赠别张中，以此感激友人曾经相助以及感慨友人的仕途遭遇。

苏轼（2010）在海南也有作了一些描写亲人的“和陶诗”，如其在元符二年（1099）正月五日在《和陶游斜川》自注：“正月五日，与儿子出游

²⁶ 冯应榴认为该诗作於元符三年（1100），王文诰则认为作於绍圣四年（1097），而孔凡礼则认为作於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各家论说尚有待考证，本文认为以上记载苏轼遭贬海南为绍圣四年之元符三年之间，故暂以王文诰之说作为依据。

²⁷ 详见《苏轼全集校注》，张中：张中因役兵修伦江驿予苏轼居，为察访董必弹劾，贬雷州监司（苏轼，2010：5018）。

作”，“谪居澹无事”（5011）。苏轼於此诗论述与幼子苏过出游的心情，而在元符三年，哲宗卒，徽宗即位。十三日，赦天下。轼赋和陶《始经曲阿》，抒闻赦后心情。（孔凡礼，2004：2844）苏轼（2010）闻此大赦喜事，曾有意返回惠州白鹤峰旧居，其和诗也有提到：“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5088）。同年二月，清明（二十四日），轼以闻子过诵书，追怀父洵，作《和陶郭主簿》。此为苏轼最后一首“和陶诗”，内容是有关其父亲苏洵、儿子苏过以及幼孙，诗引云：“清明日闻过诵书，声节闲美。感念少时，怅焉追怀先君宫师之遗意，且念淮、德二幼孙。无以自遗，乃和渊明二篇。随意所寓，无復伦次也”（苏轼，2010：5074）。苏轼在以上“和陶诗”多处提到亲人，反映了亲情是苏轼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承上所论，下表分别记录与苏轼海南生活相关与无关之“和陶诗”的数量统计：

“和陶诗”			
类别		与苏轼海南生活相关	与苏轼海南生活无关
纪年/苏轼年龄			
绍圣四年（1097）/ 苏轼六十二岁		《和陶止酒》、《和陶还旧居》、《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示周掾祖谢》、《和陶劝农六首》、《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停云四首》、《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田舍始终春怀古二首》、《和陶赠羊长史》	《和陶东方有一士》
绍圣五年（1098）/ 苏轼六十三岁		《和陶使都经钱溪》、《和陶和刘柴桑》、《和陶西田穫早稻》、《和陶下溪田舍穫》、《和陶戴主簿》	《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
元符二年（1099）/ 苏轼六十四岁		《和陶游斜川》、《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	
元符三年（1100）/ 苏轼六十五岁		《和陶郭主簿二首》、《和陶始经曲阿》	
无系年/备考		《和陶怨诗示庞邓》*	

首/总计	二十五篇/五十三首	四篇/四首
------	-----------	-------

表四：与苏轼海南生活相关/无关之“和陶诗”

*作于惠州或儋州与作诗系年待考证

苏轼於海南所作“和陶诗”计有二十九篇/五十七首；与苏轼生活相关之“和陶诗”，有《和陶止酒》、《和陶还旧居》、《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示周掾祖谢》、《和陶劝农六首》、《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停云四首》、《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田舍始终春怀古二首》、《和陶赠羊长史》、《和陶神释》、《和陶使都经钱溪》、《和陶和刘柴桑》、《和陶西田穫早稻》、《和陶下潞田舍穫》、《和陶戴主簿》、《和陶游斜川》、《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和陶郭主簿二首》、《和陶始经曲阿》与《和陶怨诗示庞邓》，共二十五篇/五十三首，比惠州时期多了十七篇/二十五首；与苏轼生活无关之“和陶诗”，有《和陶东方有一士》《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与《和陶神释》，共四篇/四首；比惠州时期少了三篇/十五首；有待考证“和陶诗”系年，仅有《和陶怨诗示庞邓》一篇/一首。综合观之，与苏轼生活存相关比无关之“和陶诗”，多了二十一篇/四十九首。

苏轼扬州时期作一篇/二十首之《和陶饮酒二十首》、惠州时期作十五篇/四十七首“和陶诗”，以及海南时期所作二十九篇/五十七首“和陶诗”，三地和陶皆出现不同的“作诗心境”（第四章继续论述）。虽然扬州“和陶之始”至惠州“尽和陶诗”为苏轼生活记录的转折点，而进入海南“陶写伊郁”后的和陶数量，更进一步说明“和陶诗”与苏轼晚年生活的关系甚为密切。

第三章 “以己适陶，以陶适己”：苏轼惠州“和陶诗”的“择陶心态”

苏轼身陷“讥刺先朝”的罪名而面临“惠州安置”的贬谪命运，其《到惠州谢表》记述贬谪惠州“尚荷宽恩，止投荒服”以及“瘴癘之地，魑魅為邻”的情况并不乐观，然而豁达於《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云：“父老相携迎此翁”与“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苏轼，2010：4440），可见苏轼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而感到欣慰。苏轼贬居惠州的生活经历不时反映在其诗文中，因晚年欣赏陶渊明而屡次和陶，反映晚年的生活事迹，以此排遣其身处惠州期间的忧患心情，展现其随遇而安的谪人心态。后世评论苏轼扬州与惠州“和陶诗”各有不同，评论者有以苏轼惠州的生活经历作为评论的首要考量。苏轼（2009）曾曰：“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苏轼，2009：1402）；袁行霈（2003）在《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曰：“和陶，在不同的程度反映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对某种身分的认同，表达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149），因此“和陶诗”成了其晚年仕途生涯的其中一项选择。苏轼外任扬州与贬谪惠州所作“和陶诗”多有不同，其惠州生活与“和陶诗”相互融合，带来了“以己适陶，以陶适己”的精神契机。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以下三个课题：（一）苏轼惠州事迹与“和陶诗”创作之关系、（二）惠州“和陶诗”的主题分析与（三）“和陶诗”的择陶心态。本文据此推断，苏轼选择陶渊明作为贬居惠州的转折点，与其《和陶归园田居六首》的诗引“今復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己耳”（苏轼，2010：4509）本意契合，并且窥探苏轼继续作“和陶诗”及其惠州生活的密切关系。

第一节 苏轼惠州事迹与“和陶诗”之关系

苏轼贬居惠州的生活与“和陶诗”之间有参照的作用。王启鹏（1990）在《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惠州和陶诗浅谈》所提及的“和陶诗的内容”，主要以三个项目作为分类：（一）反映他的寓惠生活和惠州的风貌、（二）抒写自我的苦闷矛盾的个性形象与（三）探讨人性价值，评价历史人物。魏

小利在〈苏轼和陶诗分类研究〉同样将“和陶诗”分为三个项目进行探讨：

（一）用陶韵且和陶意（其一、赠别思亲诗；其二、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诗作；三、哲理诗）、（二）用陶韵而抒己怀（其一、咏史诗；其二、咏怀诗（三）改韵诗。本文根据以上资料，以探讨苏轼在惠州所作诗、文与各“和陶诗”之间的内在关系，进一步理解其“惠州和陶”的形成与创作历程。

绍圣二年（1095）三月五日，苏轼在《和陶归园田居》提及，其以此作为扬州之后的继续创作，如同其於海南告知苏辙“吾前后和其诗几百数十篇”，一和便是剩下的一百零四首“和陶诗”。苏轼有不少以生活写照为例的创作，可以见於其诗、词、文与“和陶诗”当中，如前往白水山的佛迹岩，在汤泉以及悬瀑之下沐浴，浩歌回返时所作的《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此“和陶诗”内容与苏轼此前所作《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题白水山》与《记游松风亭》的游记散文²⁸相近。

早在苏轼游白水山的三个月前，曾於此处作《白水山佛迹岩石》，诗云：“神工自炉鞴，融液相缀补”以及“方其欲合时，天匠麾月斧”（苏轼，2010：4472）。此诗主要赞颂白水山佛迹岩的雄姿；而其《咏汤泉》则抒发其享受沐浴的心情犹如“郁攸火山烈，鬻沸汤泉注”，以及描述白水山汤泉的场景如“岂惟渴兽骇，坐使痴儿怖”以及“山中惟木客，户外时芒履”（苏轼，2010：4480）；而其《题白水山》一文则记述外游白水山的经过，并记下了同游者的名单。苏轼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与以上游记文章的论述各有特色，如：赞颂白水山、记游后心情、描写汤泉沐浴的情景以及记下出游者的友人名字。

苏轼於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情况并不乐观，然而对於降职一事，其《到惠州谢表》却字字透露对於朝廷的忠心。另外，苏轼在其

²⁸ 前文已论述苏轼岭南、海南诗作约有410首，而与陶有关的诗作多达160首。自绍圣元（1094）之建中靖国元年（1101）约七年间，平均每年写作23首与陶有关的诗，这时期为苏轼生平以及与陶有关诗作数量、比例的高峰。除了《白水山佛迹岩》、《咏汤泉》、《题白水山》、《记游松风亭》，苏轼亦“预设”一个“创作平台”而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以此多提供另一个选项以反映其惠州的生活事迹。

诗《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云：“父老相携迎此翁”（苏轼，2010：4440）。以上谢表与诗歌的文体性质不同，故内容格调亦不同；苏轼看似已落入穷途末路，於前者感到落魄於惠州，而后者则表现了与惠州人民互动，并且以平静心态看待人生困境。²⁹

苏轼初到惠州落脚，不久便在《寓居合江楼》云：“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苏轼，2010：4442）。苏轼另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题诗曰：“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暎”（苏轼，2010，4454）。苏轼一方面以自适的心情居住於合江楼，另一方面则以乐观与随遇而安的心态接受谪居惠州的事实，所以在《题合江楼》一文描写“今岁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沙乎”（苏轼，2010：8115-8116）。

绍圣二年（1095），苏轼（2010）作《题嘉祐寺壁》提到“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轼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风亭，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明年三月，迁于合江楼之行馆。得江楼廓敞之观，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见所欣戚也”（8112）；而在《记游松风亭》云：“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止息”（8113）；其《迁居》诗引记述於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其抵达惠州之后便居住在合江楼。同月十八日，自合江楼迁居到嘉祐寺，不久又迁回合江楼居住。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又回返嘉祐寺居住，并且在白鹤峰建筑新居，自此计划於此生活。苏轼处於居无定所的情况，因此於此诗云：“今年復东徙，旧馆聊一憩。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4746）。以上诗文说明了苏轼於惠州迁居的路线：合江楼（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嘉祐寺（十月月十八日）——合江楼（绍圣二年三月十九日）——又回到嘉祐寺（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白鹤峰新居）。自绍圣元年

²⁹ 学界对于苏轼於黄州、元祐时期以至岭海时期，其“和陶学陶在艺术上基本失败的”，杨子怡认为诸家分歧大，足见此三个时期的诗与早期的时候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各有特点以及变化明显。惠州之贬，是苏轼岭海迁谪之始，这时期的作品，无论题材、内容、内心情感，还是审美人格都明显表现出与黄州的不同。苏轼南迁惠州的诗作却全然没有逐客悲歌的情调。黄州时期的那种遭受挫折之后的悔恨不平之气消失殆尽，作者的心态显得平和许多。（杨子怡，2008：322-330）

(1094)至元祐三年(1096)苏轼在两年间多次迁居,直到“欲迁白鹤新居”而终见落脚於此,其《和陶移居二首》的诗引也有提及:“得归善县后隙地数亩,父老云:此古白鹤观也。意欣然,欲居之”(苏轼,2010:4737)。除了史料记载,苏轼的诗、文与“和陶诗”也有提供参考的空间来反映其惠州的迁居状况。

另一方面,苏轼(2010)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一文云:“鹤观一峰,独立千巖之上”,“古有齐宫,号称福地”,“东坡先生,南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歟之心,更作终焉之计”,“愿同父老,宴乡社之鸡豚;已戒儿童,恼比邻之鹅鸭。何辞一笑之乐,永结无穷之欢”(7150)。苏轼在“白鹤新居”建成之际已有“终焉之意”,坦然表明其向往“愿同父老”与喜爱惠州的想法。³⁰苏轼(2010)在《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六描述:“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头王臯暂到郡外,令计料数间屋材,惟速为妙”(6060)。以上记述为苏轼反映其惠州新居的建造过程,同时也提到了苏轼对新居建成的兴奋与期待。

绍圣四年(1097)正月,苏轼(2010)在《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云:“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庄子往还”(4804)。苏轼在此说明了回归中原的希望遥不可及,只有白鹤峰快要建成的房子即将成为归宿。苏轼则在此诗其二说明了居家的设计,诗云:“待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暑一壶冰”(4806)。另外,苏轼则在《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尽,乃得泉》云:“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劳,易此寝处干”,“终日但迸火,何时见飞澜”,“一勺亦天赐,曲肱有馀欢”

³⁰ 王启鹏在《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惠州和陶诗浅谈》论述苏东坡在惠州的和陶诗,其和陶诗为了“陶写伊郁”,故他“未尝规规于学陶”,完全是“随意而遇”,“手写其口”的,只要他在生活中遇到了和陶渊明相似的情景,他的诗思就油然兴。如他贬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重九将至,而樽俎萧然,就引起了和《贫士》的念头。白鹤新居将成,欲迁居其中,又和《移居》诗。读东坡的和陶诗便可帮助我们找到他寓惠期间的思想轨迹。因为这些诗作是他纯真感情的表露。他到惠州时又受到惠州人民的热烈欢迎,他的恐惧心情才渐渐消失。(王启鹏,1990:63)另参阅朱靖华在《苏轼论》论述有关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情况。(朱靖华,1997:190)

(4809)。以上诗文可见，苏轼虽然感叹“中原北望无归日”，可是从苏轼新居“几近建成”、“即将迁入”乃至叙述新居将凿井引水“妥善迁入”的喜悦心情来看，其“终焉之计”的想法则是逐步尘埃落定。

苏轼於绍圣四年（1097）三月五日在《和陶时运四首》的诗引中论述：“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4712），随后完成了一段时间的迁居计划。苏轼从“居无定所”、“欲居白鹤山”、“更作终焉之计”、“期待新居建成”乃至“白鹤峰新居成”，《和陶时运》总括其历时约有二年四个月迁居生活。苏轼在此诗其一云：“我卜我居，居非一朝”（4812）；其二云：“江山千里，供我暇曷”（4813）；其三云：“岂无亲友，云散莫追”（4814）以及其四云：“子孙远至，笑语纷如”（4814），一气呵成地说明其在惠州安顿下来后的感想。

苏轼在惠州安定下来之后，不时书写了惠州风貌，如《食荔枝二首》其二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4744），以此说明其喜爱惠州的想法；其《待旦》云：“世无陶靖节，此乐知多少”（5542），以此论述其向往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而其《暮归》也描写了惠州的大自然景色，如牛羊的画面，犹如沁人心脾的一幅画。（5644）。此外，苏轼於惠州曾作《惠州祭枯骨文》³¹云：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恭惟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是用以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家伤残，蝼蚁穿穴。但为藁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苏轼，

2010：7070）

³¹ 相关研究可参阅《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郑芳祥，2006：106）。

其在《惠州官葬爆骨铭》云：

有宋绍圣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岂无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

东坡居士铭其藏曰：人耶、天耶？随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

枯颅。后有君子，无废此心。陵谷变坏，復棺衾之。（苏轼，

2010：8499）

苏轼在《惠州祭枯骨文》与《惠州官葬爆骨铭》皆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其不忍心看见暴骨遍布荒野的惨景所以写道“所恨犬家伤残，蝼蚁穿穴。但为藁冢，罕致全躯”，因此作铭文让死者“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得以安息。苏轼在杂记的书写方面，以《记惠州土芋》一篇记录了“土芋”的生长特性，分析该植物的用途：

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为粮，不復疫疠，知此物之宜人也。

《本草》谓芋，土芝，云：“益气充肌。”惠州富此物，然人

食者不免瘴。吴远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包，

煨之火，过熟，乃热噉之，则松而膩，乃能益气充肌。今惠人

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瘴固宜。”丙子除夜前两日，

夜饥甚，远游煨芋两枚见啖，美甚，乃为书此帖”。（苏轼，

2010：8429）

而另一篇杂记《记岭南竹》则记录了“竹”给予生活上带来的用途：

岭南人，当有愧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

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真可谓一日不可无此

君也耶？（苏轼，2010：8430）

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苏轼的侍妾王朝云病逝后，其陆续作了相关诗、文与“和陶诗”纪念亡妾，如其《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提及“长春如稚女”，“谁言此弱质”，“短句馀清悲”（苏轼，2010：4778）等诗句，王文诰认为是“悼念朝云”之意。同月，苏轼作《朝云墓志铭》云：“东坡先生侍妾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年三十四”（1630）。苏轼又於同年八月三日，於其作《悼朝云》引云：

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苏轼，2010：4767）

其诗云：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苏轼，2010：4768）

苏轼（2010）於九月重阳，在《丙子重九二首》悲叹云：“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4772）以上诗句皆反映苏轼对王朝云的回忆、生活背景、思念与离世的悲痛。王朝云的离世对苏轼来说为要事，除了墓志铭、悼念文与诗歌之外，其悲痛之心情亦见於《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此“和陶诗”乃苏轼心情写照的另一个例子。

除了以上诗文，与“和陶诗”题目相关的文章与提及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如其绍圣年间所作《题渊明咏二疏》。诚如《书陶渊明乞食诗后》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以及“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苏轼，2010：7558）。绍圣二年（1095）二月二十一日，苏轼（2010）在《书渊明

《东方有一士诗后》云：“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以及“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7567）。苏轼於惠州所作《书渊明酬刘柴桑诗》也有云：“陶彭泽云：‘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此言真可为惕然也（7568）。”

以上文章有四个特色：一、以“渊明”二字作为主题；二、皆与其作《和陶咏二疏》、《和陶乞食》、《和陶东方有一士》和《和陶酬刘柴桑》中“二疏”、“乞食”、“东方有一士”、“酬刘柴桑”的“和陶诗”诗题相同；三、以上文章皆与“和陶诗”内容无关，独立成篇；四、苏轼得到陶渊明的生活启发，对惠州生活没有更多奢求，只求平淡度过。

苏轼於惠州的生活经历，与所作之诗、文与“和陶诗”同时提供了相互参照的作用，可见“和陶”并不是唯一选择，然而却总括了苏轼在惠州的生活面貌。苏轼的惠州生活轮廓成了“主要”，加上此时期对於陶渊明的选择更加明显，进而带出了“和陶诗”的“次要”关系，“主次”相互相承，让苏轼在困顿的生活中找到了“以己适陶，以陶适己”的精神寄托。

第二节 惠州“和陶诗”的主题分析

按照王文诰《苏轼诗集》的编排，在苏轼贬居惠州约两年七个月的时期，其主要经历的事迹有“惠州安置”、“迁居生活”、“侍妾王朝云逝世”与“入住白鹤峰新居”等等。苏轼於此时期的“和陶诗”提供了许多参考作用，主要包括从惠州“尽和陶诗”一直到离开惠州的“生活记录”。纵观“和陶诗”的诗引与内容，苏轼主要记录了“出游”、“生活困苦”、“思考人生”、“迁居”、“赠友诗作”、“悼念王朝云”、“新居建成”以及“友人到访”的生活经历。

王启鹏在《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皆有论及苏轼在解决疾病和物质生活困难方面、解决举目无亲的个人情感方面以及解决提防政治诬陷方面的突围方法。王水照指导的博士学位学生金甫暉在论文《苏轼和陶诗研究》将

“和陶诗”分类为生活记事、亲友情深、论史评人、哲理与士人心态。本文得此启发，将苏轼惠州的“和陶诗”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主要有“写酒心态”、“生活写照”、“亲情与友人互动”与“人生思考”：

“和陶诗”类别 “和陶诗”主题	与苏轼生活相关之“和陶诗”
一、写酒心态	《和陶贫士七首》、《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引、《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并引、
二、生活写照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和陶移居二首》并引、《和陶酬刘柴桑》*
三、亲情与友人互动	《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和陶时运四首》并引、《和陶庞参军六首》并引
四、人生思考	《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

表五：苏轼惠州“和陶诗”之主题分类

*作于惠州或儋州与作诗系年待考证

（一）写酒心态

除了苏轼外任扬州所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其贬居惠州一年后再次於《和陶贫士七首》的诗引中，以酒自述：“樽俎萧然”（苏轼，2010：4598）。苏轼分别在此诗其一云：“长庚与残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须臾晖”、“我欲作九原，独与渊明归”（4598）；其五云：“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阳”、“无衣粟我肤”、“贫居真可叹”（苏轼，2010：4605）；其七云：“我家六儿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见不识，今与农圃俦”（苏轼，2010：4608）。苏轼在以上诗句描写其惠州生活的贫苦、苦叹与亲人的分离之苦，只期盼不再流落偏远之地，只想与渊明同归，过着平淡的生活。另外，其《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苦叹云：“酒尽米尽，取米欲酿，米亦竭”，又云：“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以及“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苏轼，2010：4790）。以上诗句皆表示纵使招待友人不周（无酒），只好自我安慰并且与友人畅快相聚。

苏轼（2010）於重阳节作《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同样以“酒”写诗，诗云：“持我万家春，一酌五柳酒”（4623）。此“万家春”与《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所写的“岭南万户酒”之意相同，唐人多称酒为春。苏轼此时想起陶渊明，以手持的“万家春”洒在地上，以对陶渊明进行祭奠，此意正好“借酒”表示其对于陶渊明的敬重之意。

（二）生活写照

苏轼（2010）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描述其游白水山的情景与心情，以“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与“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4509-4510），以及诗其三“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4515）等等诗句，表达其“适”、“闲”、“悠悠”、“觉身轻”与“咏而归”的怡然自得心情，诗句也不见苏轼苦闷的谪人心情。

苏轼（2010）在《和陶移居二首》也有相似的描述，如嘉祐寺迁往合江楼一年后所作的“和陶诗”，并有“居白鹤观”之意，诗其一云：“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4738）；其二云：“今为一廛氓，此邦乃得之”，“江山朝福地，古人不我欺”（4740）；而其《和陶酬刘采桑》则云：“穷冬出甕盎”（4787）。此诗歌所写的栽种生活也是自适生活的表现，因此不难发现“和陶诗”反映苏轼向往野外的生活，将自己看作惠州子民一样。

（三）亲情与友人互动

苏轼於《和陶移居二首》曾提及其早有定居白鹤观的想法，后来此事成真。后来，苏轼又逢长子苏迈携带孩子自远处探访，所以在《和陶时运四首》其一云：“我卜我居，居非一朝”（4812）；其二云：“江山千里，供我暇曷”（4813）；其三云：“岂无亲友，云散莫追”（4814）；其四则云：

“子孙远至，笑语纷如”（4814）。苏轼在以上“和陶诗”描写其与亲人齐聚一堂的情景，自然句句倍感温馨。绍圣三年（1096）七月五日，苏轼在侍妾王朝云病卒於惠州后作《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王文诰认为此“和陶诗”之用意为“悼朝云也”，诗以长春花兴比，与梅花词同一感悼，乃绍圣三年（1096）十月作於惠州。倘若此诗为苏轼纪念王朝云所作，“长春如稚女”，“谁言此弱质”，“短句馀清悲”（4778）等诗句皆是苏轼为了抒发其对于王朝云的思念以及悲伤的真情流露。

绍圣四年（1097）二月初六，苏轼友人周彦质罢循州，拜访苏轼，作《和陶答庞参军》。苏轼（2010）描述友人“罢归过惠”以及留住友人半月时光，在离别前特作此“和陶诗”以“追送之”，如其一云：“子非玄德，三顾我庐”（4824）；其二云：“虽云晚接，数面自亲”（4825）；其六云：“吾生一尘，寓形空中”、“功名在子，何异我躬”（4828）。苏轼遥想其居所为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草庐，说明即使晚接友人，见面依旧感到熟悉。苏轼抱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交友心态，与友人的谈话中形容自己就像尘埃的微小事物，存在於空中，并且解释功名不分你我（苏轼与友人），有此友人相伴与相识，当为人生一件乐事。

（四）人生思考

苏轼（2010）在《和陶咏三良》曰：“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此“和陶诗”解释三良为了秦穆公牺牲殉命，其生命犹如轻於鸿毛。苏轼认为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命乃轻视生命，身为臣子者是可以不从命的。苏轼作此“和陶诗”与其嘉祐六年《凤翔八观·秦穆公墓》诗作提到“为秦穆公牺牲”的论述截然不同，诗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能杀其身”（339）。观照《和陶咏三良》与《凤翔八观·秦穆公墓》二诗，表现了苏

轼在嘉祐与绍圣时期的仕途看法是有区别的。³²

苏轼在惠州时期作“和陶诗”，正好能够理解其选择陶渊明的目的，如扬州和陶以“酒”作为主要的创作主题，完成其“和陶之始”的创作；而惠州除了“以酒重合”之外，其“和陶诗”的生活面貌便以不同的主题展现出来。苏轼於杨、惠两地“和陶”不同，前者“饮酒”为了排遣心情，而后者的“和陶心态”偏向“生活记录”、“向往稳定居所”与“重视友谊”。

苏轼在《和陶时运四首》提到新居建成以及家人团聚的喜悦心情，《和陶岁暮张常侍》、《和陶答庞参军六首》所描述的手足之情，对苏轼的生活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苏轼身处偏远的惠州贬所，此时期的“和陶诗”多此反映其随遇而安的豁达心态，比较少流露其谪人的心情，仅在《和陶贫士七首》与《和陶岁暮张常侍》记录了生活上的困苦。

第三节 “和陶诗”的择陶心态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380），年纪近三十的陶渊明³³因苦於生计问题而决定出仕当官，但不久却辞官归田。《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復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房玄龄，1998：2461）。陶渊明於《五柳先生传》自述云：

³² 苏轼咏史诗与生活中的感触而发，可从其早年所作《秦穆公墓》与晚年作《和陶咏三良》看出差别。苏轼不再单纯认为三良之殉是自愿的忠义行为，而是暗示乃为秦穆公的命令。诗人对君王的命令提出质疑，认为君王的命令可分为治、乱两种，而后者就没必要遵守。而苏轼作《和陶咏二疏》与《和陶咏荆轲》虽然咏陶渊明，而又兼出己意。苏轼的咏史诗在内容上抨击古之弊端，又讽刺今之时政，表示对前贤高士的追慕，有流露自我情怀。该课题研究可详阅《宋代咏史诗研究》。（张小丽，2006：141-145）另外，刘宾红曾在《“三苏”咏史怀古诗研究》针对苏轼在咏史怀古诗的思想内容、创作艺术、价值及影响方面作过相关研究。（刘宾红，2008：15-46）

³³ 本文所论陶渊明所处之时代背景，主要整理自《晋书·隐逸传》。（房玄龄，1998：2460-2462）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渊明，2011：344）

陶渊明总结其性格、生活背景以及对“用世之心”不感兴趣，意在远离世俗以及向往独居生活。徐公持（1999）在《魏晋文学史》论述陶渊明“毕生走过三个时期，各时期界限分明，分别为在家闲居、出仕、隐居。他终以隐居闻，《宋书》、《晋书》、《南史》皆入《隐逸传》”（549），其认为“陶渊明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大诗人之一。他的任真人格，他的优秀诗文尤其是“田园诗”，具有极大魅力，在后世拥有众多仰慕者。他的诗文以自然风格特性，在魏晋南北朝诗坛上以及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独标高格”（599）。李长之在《陶渊明专论》以三个阶段总结陶渊明一生：一、二十九岁前过着种田与读书生活；二、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期间担任几次小官吏；三、四十二岁到六十三岁，其眼见桓玄政权倏起倏灭，刘裕慢慢握起大权，代替桓玄、逼死晋朝最后两个皇帝，建立了新王朝，其目睹纷乱以及惨杀遂作出隐居决定。苏轼晚年约八年间的“和陶诗”分别在“外任——贬居”完成；而陶渊明晚年约卅载³⁴（四十五岁至七十五岁之间）的诗歌作品则分别在“在家闲居——任官——隐居”完成，以下区别两者的创作背景以及诗作主题：

³⁴ 学界对陶渊明享年各有论说，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的陶渊明享年考辨，认为其享年应介於六十九岁至七十八岁之间。（袁行霈，1997：215）此章节所论陶渊明晚年诗作（不包括《饮酒二十首》），主要参考《陶渊明集笺注》。（陶潜，2011：427-444）

苏轼				陶渊明		
生活背景	扬州（外任）	惠州（贬谪）	海南（贬谪）	在家闲居	仕	隐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元祐七年（1092）三月至七月 • 约五个月 • 五十七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绍圣元年（1094）六月至绍圣四年（1097）四月 • 约两年七个月 • 五十九至六十二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绍圣四年二月（1097）至元符三年（1100）二月 • 约两年八个月 • 六十二至六十五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 • 四十五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 • 约四年 • 五十至五十四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至宋文帝元嘉三年（426） • 约二十一年 • 五十四至七十五岁
写酒心态	《和陶饮酒二十首》	《和陶贫士七首》、《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并引、《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并引	《和陶止酒》并引、《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并引、《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赠羊长史》并引	-	-	《连雨独饮一首》
				《止酒一首》*		
生活写照	-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和陶移居二首》并引	《和陶九日闲居》并引、《和陶使都经钱溪》、《和陶还旧居》、《和陶始经曲阿》、《和陶游斜川》、《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和陶	《和郭主簿二首》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一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首》、《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首》、《游斜川一首》	《归园田居五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一首》、《岁暮作和张常侍》、《乞食一首》、《酬刘柴桑一

			拟古九首》、《和陶西田穫早稻》并引、《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田舍始终春怀古二首》并引、《和陶下溪田舍穫》、《和陶戴主簿》、《和陶游斜川》			首》、《桃花源记》并诗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一首》*、《移居二首》*、《时运一首》*、《九日闲居一首》*
亲情与友人交往	-	《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和陶时运四首》并引*、《和陶桃花源》并引、《和陶庞参军六首》并引*	《和陶止酒》并引、《和陶停云四首》并引*、《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和陶游斜川》、《和陶郭主簿二首》并引、《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	-	-	《于王抚军座送客》、《答庞参军一首》四言、《答庞参军一首》五言
				《与殷晋安别一首》*、《停云一首》*		

			军》*			
人生思考	-	《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	《和陶示周掾祖谢》、《和陶东方有一士》	-	-	《形赠影一首》、《影答形一首》、《神释一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首》、《读山海经十三首》、《和刘柴桑一首》、《己酉岁九月九日一首》、《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赠羊长史一首》、《咏贫士七首》、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还旧居一首》*、《咏二疏一首》*、《咏三良一首》*、《咏荆轲一首》*、《拟古九首》* *

表六：“和陶诗”与“陶诗”的创作背景
*作诗系年待考证

宋代“苏门四学士”——黄庭坚（2011）在《元祐间大书渊明诗赠周元章再跋》认为：“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惟觉书字，倍蓰增胜。復於范君仲处见东坡惠州自书所和陶令诗一卷，诗与书皆奔轶绝尘，不可追及，有怅然自失也”（1090）。另外，黄庭坚在《跋子瞻和陶渊明诗》也有论及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

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1059）。张宏生在（1984）在《苏东坡的和陶诗》分析《和陶酬刘柴桑》曰：“苏轼写得从容自得，风格象陶诗，可让人觉得勉强。‘一饱忘故山’的‘忘’往往是并不能忘的象征。就象他说‘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和陶和刘柴桑》）一样，实际上也是忘不了。苏轼强迫自己不想。苏轼在《和陶还旧居》禁不住哀叹其不敢梦故乡，可见这压抑多么沉重。东坡痛苦，读陶诗有助于麻醉自己，借陶诗压抑自己”（55）。袁行霈（2003）在《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云：“和陶，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标志着对某种身分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149）。陆莹在《问花楼诗话》卷二评《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先广文爱其和陶诗，以谓此老晚年进境”（曾枣庄，2001：1659）。

据上而论，苏、陶的诗歌作品以及主题相似，不同点在於苏轼没有先后依照“陶诗”的作诗系年作“和陶诗”。苏轼在惠州时期所选择的陶诗较少，在海南时期所选择的陶诗较多，两地“和陶”反映苏轼晚年的生活心态已经转向陶渊明。苏轼於扬州和惠州的“写酒心态”不同，前者为了避开朝廷是非而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后者诉说惠州困苦生活与亲人分离之苦，因此其《和陶贫士七首》、《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与《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等诗句多表现了“借酒浇自我块垒”的心情。赵克宜评《和陶贫士七首》其五云：“平易真率，不为高论，所以似陶”³⁵（曾枣庄，2001：1689），而纪昀则以作者的生活情况进行分析：“‘岂知江海上’二句，“落英”句是以餐花为苦况，非以餐花为高致。观下六句“典衣作重阳”以下，可见”（1689）。此论述与赵克宜评点《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的“借情抒愤，然用古人语咏古人，故无痕迹。‘草中实后凋’自负语”相似（1776）。

³⁵ 有关《和陶饮酒二十首》的“似陶”与“不似陶”的情况，本人於拙文《苏轼和陶饮酒诗中的“苏意”》已曾论述以及梳理分析，可参阅之。（陈润隆，2016：204-208）李剑锋认为，苏轼“和陶诗”虽然在艺术上，乃至意蕴上以陶诗为楷模，但毕竟是对自我真情实感的个性抒写，是新的人生觉悟的表达。“和陶诗”的深层意蕴虽与陶诗有“似”的一面，但也有“不似”的一面，这“不似”的一面正是苏轼独具的审美价值，正是苏诗“美好”所在。（李剑锋，2002b：20）

温汝能《和陶和笺》卷四引樊潜庵评《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岁暮缺酒，事极可叹，此渊明，此渊明所以有“履运增慨然”之咏也。公兼有佳客，反不作悲楚语，岂愁极强为欢者乎？（曾枣庄，2001：1736）参考此评论，反映苏轼因“无酒为叹”而无法招待友人吴远游与陆道士，因此以款待友人为基本的相处之道，展示其重视友谊的一面。

苏轼也有将“生活写照”³⁶各别记录在《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和陶移居二首》与《和陶酬刘柴桑》中。许学夷在《诗源辨体》后集纂要卷一认为：“和《归园田》，乃以游白水山至荔枝浦当之，其境趣判不相合，安在其为和陶也”（曾枣庄，2001：1659）。此观点说明此诗与陶诗不同，尤其认为作者为了烘托出游之境。王直方则在《王直方诗话》认为此诗“似陶”曰：“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园田》六首，乃与渊明无异”（苏轼，2010：4522）。赵克宜在《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八评《和陶归园田居》其一“淡语似陶，结处静中体验语”，评其二“春光有佳句，我醉坠渺莽：淡岩竟住好。此种是东坡独造”（曾枣庄，2001：1661）。

纪昀《苏文忠公诗集》卷三九评《和陶移居二首》曰：“‘其二’绾合有致，此种是东坡本色（曾枣庄，2001：1738）。袁宏道则在评阅谭元春选《东坡诗选》云：公谪居乃亦好修作耶？快士性固然，不可改也”（1737）。袁宏道认为作者“寻找安身之处”与作者欲居白鹤观以及迁居的情况相符，又如王文诰评《和陶酬刘柴桑》：“《酬刘柴桑》诗，乃白鹤新居蒔植之作，当改编丙子。彼（案，指《和陶刘柴桑》）则经况瘁，此则从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诗之气味，亦绝不类也。又《酬刘柴桑》有“穷冬出甕盎”句，

³⁶ 曾辉在《“平淡”中的“至味”——苏轼“平淡”诗论探微》认为，自由式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状态，一种超越的状态、解放的状态。在外摆脱物质的束缚，在内摆脱功利的纠缠。当自由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时，审美就产生了。审美是个体生命当下的自由直观，是超功利的活动。当生命个体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时，他便会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感悟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美。人在精神上寻求超越，获得自由，但同时并不轻视人间万象，不执着于人际价值是非，与身边的一切和谐相处，用自由的心境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曾辉，2008：24）

与林抃送花木事相合，当作於此时也（4788）。樊潜庵评“并前《和戴主簿》之作，於极凄惨中摇曳而去，无愤懑语，公真能处约者矣”（4789）。王文诰与樊潜庵所评如出一辙，并认为作者在惠州过得闲适，如《和陶酬刘柴桑》“穷冬出甕盎”的栽种生活般怡然自得。苏轼与陶渊明晚年在生活上的诗作表现相似，不同在於前者贬谪而后者出仕。

陶渊明於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其於寻阳任官期间比闲居家中不同，主要是作者诗意不比前者闲适。作者与友人出游斜川的时候作《游斜川一首》，其诗引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陶潜，2010：63），而诗云：“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復如此不？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64）。作者表达其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因此寄情山水并与友人饮酒畅谈，盼望能够“忘彼千载忧”。同年，陶渊明在荆州刺史桓玄幕府任职告假返乡途中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一首》，诗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养真衡茅下”（137）皆表达作者向往郊外以及独居的生活。陶渊明后来赴任镇军参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在途中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首》，也一样表现了“委怀在琴书”、“暂与园田疏”、“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与“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128）的自适心情，述说作者徘徊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心情。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过钱溪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首》曰：“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陶潜，2010：148）。此诗同样表达作者被约束并且与田园生活逐渐疏远，盼望“归故里”的隐居生活说明了陶渊明对仕途的疑惑。钟嵘将陶渊明诗歌总体看法，列入《诗品》之中品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与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并且评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

潜，2007：260）。陶渊明友人颜延之於《靖节征士诔》并序为陶渊明作诔文云：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絢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浔阳县之某里。近识悲悼，远士伤情，冥默福应，呜呼淑贞。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萧统编、李善注，1986：2470-2472）。

陶渊明晚年作诗与其生活背景息息相关³⁷，如“南岳之幽居者也”、“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弃官从好”、“心好异书”、“贵贱何算焉”皆为陶渊明的人生缩影。后世认为陶渊明诗作表达了“不慕荣利，厌弃世俗”、“向往隐居、安於贫居”、“田家与躬耕生

³⁷ 相关论述可详阅张帆〈别有天地非人间——浅析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张帆，2008：72-75）

活”、“思考人生”与“交友之道”的思想内容。评论者以及陶渊明自传《五柳先生传》皆有参照作用，由此凸显陶渊明的为人，如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一首》云：“公自谓性爱闲静，不慕荣利，於此诗起结数语，尤可想见”（陶潜，2004：177）；方宗诚《陶诗真诠》评《游斜川一首》云：“收四句‘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全是素位而行、不愿乎外之意，不可误会为旷达己也”（90）；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首》：“孔明初出茅庐，便有归耕南阳之想；渊明始作参军，便有终返故庐之志，其胸怀一而已。至於一返一不返，时势不同，所遭各异也”（166）。

在“亲情与友人互动”思想内容方面，赵克宜在《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九评《和陶时运四首》：“得陶意居多”（曾枣庄，2010：1743）以及评《和陶庞参军六首》其二“得陶之淡”（1748）。查慎行则在《初白庵诗评》卷中评《和陶时运四首》其四“一团和气，可以居夷”（1743）。此评与《和陶时运四首》诗引“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以及《和陶时运》其四“子孙远至，笑语纷如”等诗句的本意相合。王文诰认为苏轼对於亡妾王朝云所流露的悲伤情感则认为“此诗，王文诰以为“悼朝云也”，乃绍圣三年（1096）十月作於惠州。其云：“《和陶胡曹示顾曹》诗以长春花兴比，与梅花词同一感悼。故云”谁言此弱质”，“对句馀清悲”也。今定为惠州作（苏轼，2010：4778）。此评论主要以“和陶诗”的系年作为考量，再判断其诗与苏轼生活所存在的关系。

在“人生思考”方面，温汝能在《和陶合笺》评《和陶咏二疏》曰：“古人之仕，去不去各从其时。二疏时可以去，故当时贤之。先生时不能去，故后世谅之。观其事迹，始终一忠爱之心，至诚测怛，虽老死暇荒，宁有悔乎？若谓先生因迁谪途穷，不无悔心，而有是作，恐非所以论先生之诗，尤非所以论先生之心”（苏轼，2010：1711）。温汝能主要以“先生因迁谪途穷”作为评论重点，契合作者贬居惠州的生活情况，接着以“对比”方式将

“二疏”与苏轼进行比较。温汝能赞同作者认为“二疏”忠心，却不认同牺牲是对的，同时赞赏作者在“恐非所以论先生之诗，尤非所以论先生之心”所表现的想法是坚定的。

美国学者包弼德（2001）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指出：“苏轼维护文化事业在士人世界中的有效性。他看到不断积累的文化传统对价值观思考的重要性，并且相信文学、以及艺术，为个人提供了培养自己有能力尽责行事的方法。苏轼没有把文章降低为道德观念的载体；相反他使之成为学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联系物我利益的普遍过程，这就使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人类整体的象征”（311-312）。本文受包弼德启发，苏轼扬州与惠州两地的“和陶内容”因仕途遭遇而不同，因此惠州“和陶”成了“和陶诗”的“发展时期”。苏轼在贬居时的“和陶”数量增加，而评论者亦从作者的生活背景来评论“和陶诗”的内容。苏轼与陶渊明的晚年心态、生活情况与仕途经历的不同，於诗歌创作上各自升华，各有特色。苏、陶晚年事迹之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晚年心态：苏轼於岭南度过晚年的贬谪生活，其“和陶诗”创作数量出现了“和陶之始”发展至“尽和陶诗”的趋势。苏轼仕途与生活的不乐观，促使其思想上向往陶渊明的达观精神，重新思考人生。陶渊明晚年隐居的诗作较多，亦是如其所愿的生活选择，因此过着真正的归隐生活。苏、陶晚年在诗歌创作的心态上，最大的区别乃是两者於仕与隐之间的选择，苏轼向往陶渊明的生活却没有因此而跟随，然而“和陶诗”却反映苏轼的生活经历与思想上的豁达已经选择了陶渊明。

（二）生活与仕途情况：苏轼贬谪岭南而没有步陶渊明后尘选择隐居生活，其“和陶诗”多侧重在反映与其生活相关的诗歌内容。苏轼於外任扬州期间的官职为寻改扬州，官至兵部尚书，充南郊卤簿使兼侍读，除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贬谪惠州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而贬谪海南则为琼

州别驾。因此苏轼一直到晚年却依然不曾归隐。陶渊明於家中闲居与任官期间，其诗作经常透露其向往归隐以及继续当官的矛盾想法。

（三）诗歌创作时间：苏轼的“和陶诗”在“外任”至“贬居”的情况下完成，历时八年（表六）；而“陶诗”却是“在家闲居”、“任官”至到“隐居”的情况下完成，历时三十年。苏、陶於诗歌创作所运用的时间不同，作诗用意亦有所不同。苏轼在惠州就曾有尽和陶渊明诗歌的想法，甚至到贬谪海南仍然有“和陶诗”的创作。陶渊明作诗仅为“好读书”与“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而且向来“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选择归隐生活。苏、陶在诗歌创作的时间运用，各别看出两者在仕途选择与生活经历上的不同，却相同地选择了远避世俗的想法，走向理想中的豁达人生之路。

第四章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苏轼远贬海南与“穷途和陶”

绍圣四年（1097）四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贬“元佑党人”，苏轼责授琼州别驾，移昌化军（今海南）安置。苏轼经历“惠州安置”之后再贬海南，无疑给他晚年再次带来重大的打击。苏轼於《到昌化军谢表》论述其遭遇“生无还期，死有餘责”（苏轼，2010：2785），感叹“臣孤老无託，瘴疠交攻。子孙慟哭於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於海上，宁许生还”（2786）。苏轼无奈形容海南“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与“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貲矣”（6068），可见海南环境何等恶劣。苏轼前往海南贬所前曾豁达在《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表示“海南万里真吾乡”（4835），在《和陶劝农六首》表现其“听我苦言，

其福永久”的用世之心（4870），其《和陶拟古九首》则流露“稍喜海南州”（4888）的自适心情，更在离开海南前於《别海南黎民表》说明自己为海南的人民（5119）。苏轼在海南所作诗、文与“和陶诗”屡次描述其生活状况，更在“非人所居”的海南表现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於惠州与海南时期最大的区别乃“和陶诗”的创作数量进入了“高峰期”，后世也多以苏轼的生活经历评论其“和陶诗”。王启鹏（2008）在〈同是遭贬谪，为何苏轼填词越后越少〉总结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儋州之后，创作词越来越少，主要是由他的生活遭遇所决定，因此精力放到“和陶诗”方面（6-7）。苏轼在《别海南黎民表》论及其坦然面对命运之心态曰“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苏轼，2010:5119）。苏轼“和陶诗”由惠州“发展时期”到海南的“高峰期”，可见其把陶渊明著作“常置左右”（苏轼，2010:6064）的喜爱程度。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以下三个课题：（一）苏轼海南事迹与“和陶诗”创作之关系、（二）海南“和陶诗”的主题分析与（三）从“和陶”到超越。本文据此推断，苏轼和陶的“高峰期”於海南贬谪时期定型，并且与其随身携带《陶渊明集》以及“陶写伊郁，正赖乎尔”的本意相合。本文以苏轼海南大量创作“和陶诗”之现象，窥探其“和陶”与海南生活之密切关系。

第一节 苏轼海南事迹与“和陶诗”之关系

苏轼晚年再贬海南之后於《到昌化军谢表》曰：“生无还期，死有餘责”，依然感恩朝廷“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又感叹“臣孤老无託，瘴疠交攻。子孙恸哭於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於海上，宁许生还”（苏轼，2010:2785-2786）。苏辙（2009）在《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铭》回忆亡兄在海南的衣食住行之条件恶劣，欣慰得到当地人的协助以建造房子，平日过着著书为乐的日子（1421）。杨玲（2009）在〈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认为“苏轼之所以能如此，即在于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思想大反思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随缘之适、自由无待的天地精神，故能处穷若

达，以他乡为故乡，获得宁静与愉悦”（59）。苏轼与海南人民相处融洽之外，更以“他乡为故乡”，在艰苦中以坦然的豁达心态面对生活。苏辙（2009）也回忆其兄晚年欣赏陶渊明，进行了不少和陶诗作（1422），可见苏轼在扬州、惠州与海南三地皆有陆续作“和陶诗”的习惯。

赵芳（2008）在硕士学位论文《苏轼海南创作研究》以苏轼在海南的生活遭遇与创作心态论析“和陶诗”的思想内容（31-44）。本文认为还能够将苏轼“和陶诗”及海南时期所作诗、文进行参照，探析苏轼贬谪海南的生活背景，亦如王启鹏在〈同是遭贬谪，为何苏轼填词越后越少〉所论述：

苏轼在创作兴趣上，主要精力放到“和陶诗”方面，亦认为王朝云的去世，使苏轼在晚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了知己，受打击遂无意创作词。在蛮瘠的惠州儋州，无激起苏轼创作词的外部条件。总结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儋州之后，创作词越来越少，主要是由他的生活遭遇所决定。（王启鹏，2008：6-7）

苏轼前往海南前，於梧州与苏辙相遇后作《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其感叹曰：“海南万里真吾乡”（苏轼，2010：4835）。苏轼此次前往海南已是穷途末路，并认为海南将会是终老之处，遂曰：“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4835）。苏轼与苏辙离别时作《和陶止酒》云：“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4839）。苏轼在琼州担任别驾一职，安置於昌化军，而苏辙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在苏轼与弟弟苏辙相遇同行至雷州之前，他们“同卧起”已有一月，往后只能无奈接受“同落百蛮里”的命运。

在海南，苏轼曾作《和陶赠羊长史》感谢友人郑嘉会船运书籍到海南，因此於此诗论述了感激郑嘉会借阅之书，让其“荒芜之地”带来无穷的阅读

乐趣（苏轼，2010：4938）。时隔半年，苏轼再於《与郑靖老四首》其一提及所借之书籍，已经与其儿子苏过进行妥当的编排，方便他日整齐归还（6190）。郑嘉会借书一事，进一步反映苏轼於海南“爱书”生活习惯。

苏轼在《和陶使都经钱溪》也有描述其“仰看桄榔树”、“相如卖车骑，五畝亦可易”（苏轼，2010：4976）的贫苦生活，而类似的叙述如其绍圣四年（1097）冬在《桄榔庵铭》诗引云：“东坡居士谪于儋耳，无地可居”，而诗云：“海氛瘴雾，吞吐呼吸”，“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东坡居士，岷安四隅”，“生谓之宅，死谓之墟”（2163）。绍圣五年（1098）四月，其《与郑靖老四首》其一则曰：“初赁官屋数间居之”（6189），而其《与程全父十二首》其九曰：“初至，僦官屋数椽，近復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茆，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6063）。苏轼在以上的书信与诗文，说明海南的贬谪生活并不如意，穷途末路的情况比比皆是。

其《和陶和刘柴桑》也有相似的心情曰：“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邦君助畚鍤，邻里通有无”以及“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苏轼，2010：4988-4989）。苏轼因为居无定所的漂流生活，加上妻子已故而抒发其孤独以及失去伴侣的心情，其在《新居》亦感慨云：“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水”（4991）。此诗透露其晚景凄苦，然而因为“结茅得兹地”而感到安慰。尽管如此，其《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也有怡然自得的心情描写，诗句主要刻画儿子苏过的朗诵歌声圆美，因此题了以下诗句云：“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4994）。

以上诗句的表现皆与苏轼迁入新居前买地建房的情形相关。苏轼在《与程秀才》其一也提及“近与儿子结茆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者助作，躬泥水之役”（苏轼，2010：6068），其二则云“新居在军城南，极湫隘，粗有竹树，烟雨濛晦，直蜒坞獠洞也”（6070）。《三苏年谱》记载“轼买曾氏地南污地之侧，起屋五间，客王介石及其他学生为助

之。张中亦助之。并手植果实”（孔凡礼，1998：2800），而《宋史》本传亦有记载苏轼得到当地人协助造房的情景（脱脱，1997：6063）。

苏轼在海南也有多方面的文字记载着海南的风土面貌，如绍圣四年（1097）九月作《黍麦说》论述：

北方之稻不足於阴，南方之麥不足於阳，故南方无嘉酒者，
以曲麥杂阴气也，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吾尝在京師，
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曲，是岁官酒比京酝。而北方造酒皆用南
米，故当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无味。今在海
南，取舶上面作曲，則酒亦絕佳。以此知其验也。（苏轼，
2010：8439-8440）

苏轼对以上植物作了详尽的叙述，可见其分析事物的细心。苏轼（2010）於元符元年（1098）九月二十七日作《书海南风土》也有记载其对海南地理的理解云：“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8125）。苏轼在考察中发现海南不适宜居住，加上生活条件恶劣，然而却总结人生无常，应该以随遇而安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困境。

在海南，苏轼也有记录植物特性的嗜好，并且撰文作杂记。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十五日，其作《记海南菊花》论曰：“菊，黄中之色，香味和正，花叶根实，皆张生药也”。苏轼所认识的菊花与海南所见略有不同，其曰：“北方随秋之早晚，大畧至菊有黄花乃开。独岭南不然，冬至乃盛发。岭南地暖，百卉造作无时，而菊独后开”，因此总结“靠其理，菊性介烈，不与百卉并盛衰，须霜降乃发，而岭南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洁如此，宜其通仙灵也”（苏轼，2010：8431）。

苏轼（2010）在《记藟米》也有分析藟米此类植物的特性云：“南海以藟米为粮，几米之十六。今岁藟米不熟，民未至艰食者，以客舶方至而有米也。然儋人物蓄藏，明年去则饥矣”（8438）。此外，苏轼在《书海南墨》也有提到其对“墨”的理解曰：“此墨吾在海南新作，其墨与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择也”（7976）。苏轼论述海南“松多故煤富”，认为“其墨与廷珪不相下”，因此“所造之墨”的质量为佳。

《宋史》本传记载，元符三年（1101年），徽宗继位，因此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复职为朝奉郎³⁸，於是苏轼获释北归³⁹。苏轼被命为琼州别驾、廉州安置，其离开儋州前於《别海南黎民表》流露其不舍之情，自我描述其本来归为海南人民，此刻忽然跨海北归，足见世事无常。苏轼原以为海南将会是终老生活的地方，此想法则与其在惠州所说的“不辞长作岭南人”相似。此外，苏轼（2010）在《儋耳》也曾表达其坦然面对生活的态度曰：“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念饱饭东坡老，一睿能专万事灰”（5121）。

苏轼（2010）离开儋州赴廉州途中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5130）。苏轼在此诗诉说自己多年深陷政治漩涡而最终得到还朝机会，因此释怀表达“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5130），说明其最终摆脱了贬谪的仕途困境。苏轼在《和陶始经曲阿》也有抒发类似的愉悦心情，诗云：“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5088）。苏轼於此诗清楚说明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惠州的白鹤峰旧居。

由於海南的生活情况极其恶劣，苏轼时常在创作中书写其身临绝境的心情。此持续性的和陶心态与和陶创作最终由惠州的“选择陶渊明”延伸至海南的“苏、陶融合”。海南的生活经历成为苏轼书写“和陶诗”的创作元素。

³⁸ 宋文散官名。神宗元丰改制前为正六品上阶，元丰三年（1080年）改为新奇禄官，地位相当於旧寄禄官行员外郎及左右司谏。见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文散官》及脱脱《宋史·职官志九》。

³⁹ 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即位。庚辰，大赦天下，苏轼因此得到离开岭南之地，回归中原的机会。（王水照，2015：99）

苏轼对陶渊明的选择与个人的心情剖白相互融合，“和陶诗”的创作给苏轼的生活穷途带来了“疗愈作用”，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豁达人生。

第二节 海南“和陶诗”的主题分析

绍圣四年（1097），苏轼年龄已届六十二岁。苏轼於此时期与家人分割两地，生活情况比惠州时期进一步恶化，因此经常透过作品来描述贬谪海南的生活困境。本文将苏轼在海南时期的“和陶诗”，在以下列表分别记录与苏轼海南生活相关与无关之“和陶诗”，主要有：“写酒心态”、“生活写照”、“亲情与友人互动”与“人生思考”。此分析旨在探讨苏轼於惠州与海南两地，在同样的“和陶主题”、心态的转变以及择陶的情况下，如何体会另一层次的生活价值观：

“和陶诗”类别 “和陶诗”主题	与苏轼生活相关之“和陶诗”
一、写酒心态	《和陶止酒》并引、《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并引、《和陶赠羊长史》并引、
二、生活写照	《和陶九日闲居》并引、《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使都经钱溪》、《和陶和刘柴桑》、《和陶还旧居》、《和陶始经曲阿》、《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和陶拟古九首》、《和陶西田穫早稻》并引、《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和陶下溪田舍穫》、《和陶戴主簿》
三、亲情与友人互动	《和陶停云四首》并引*、《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和陶游斜川》、《和陶郭主簿二首》并引、《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
四、人生思考	《和陶示周掾祖谢》、《和陶东方有一士》

表七：苏轼海南“和陶诗”之主题分类

*作于惠州或儋州与作诗系年待考证

（一）写酒心态

苏轼与苏辙在藤州相遇，其自叹“痾病”是因为饮酒而起，接着立意戒酒以便痊愈，因此在《和陶止酒》云：“微痾坐杯酌，止酒则疗矣”、“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苏轼，2010：4839）。苏轼在《和陶连雨独饮二首》也有借酒杯抒发其思念苏辙的心情以及感叹时光稍纵即逝，诗云：“晚景最可惜，分飞海南天”以及“寄语海北人，今日为何年”（4858）。苏轼於此诗其二表示自己平日在海南以“酒杯自娱”，意在排遣郁闷的谪人心情，诗云：“伯雅亦酒杯名”（4850）。另外，为了表达对友人郑嘉会借书的感激，苏轼在《和陶赠羊长史》云：“此书久已熟，救我今荒芜”以及“顾惭桑榆迫，久厌诗酒娱”（4938）。作者在以上诗句再次以“酒”烘托内心的想法，以“厌酒”来说明阅读所带来的愉悦心情，让作者得到心灵慰藉。

（二）生活写照

苏轼在海南时期的“和陶诗”内容包含许多生活情节，如重阳节作《和陶九日闲居》云：“龙山忆孟子，栗里怀渊明”、“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以及“但愿饱秔稌，年年乐秋成”（苏轼，2010：4881）。此诗表达作者愿像陶渊明那样过着平淡以及自给自足的生活。苏轼在《和陶怨诗示庞邓》也有表示其对海南生活的无奈以及不适，诉说自己过着“居无室”的生活，因此感慨曰：“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绍圣五年（1098）二月，苏轼在《和陶使都经钱溪》自述初到海南的悲凉生活，诗云：“仰看桄榔树”、“相如卖车骑，五畝亦可易”；在《和陶和刘柴桑》则感叹曰：“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4988）、“邦君助畚鍤，邻里通有无”以及“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4989）。

苏轼记录生活的经历与其丧妻的悲痛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诗句透过“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的描述来倾诉悲伤的心情。此外，苏轼（2010）

同样在《和陶还旧居》抒发同样的悲叹，此诗歌内容论述其梦见自己回到惠州白鹤山旧居，其因为思念旧居而云：“不敢梦故山，恐与坟墓悲”与“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4853）。此诗句表达了作者在仕途的困境以及对生活的感慨，因此“和陶诗”是苏轼用以表达生活经历的内心寄托以及内心话语。承上所论，苏轼始终在“和陶”的过程中提及白鹤峰旧居，比如元符三年（1100）正月，苏轼在宋徽宗即位后作《和陶始经曲阿》云：“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5088）。

苏轼在海南的生活记录也与当地人民有关，如作者在《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其一云：“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其二云：“借我三畝地，结茅为子邻”，“鳩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苏轼，2010:4935-4936）。苏轼在此诗表达了亲民的一面，透过诗句“城东两黎子”、“结茅为子邻”与“化为黎母民”的书写，编织了一幅作者与人民共同生活的画面。苏轼海南为“瘴疠之地”、“非人所居”与“出无友”之地，对于友人远渡拜访是倍感期待的，如《和陶杂诗》其一云：“谁信我忘身”，“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其二云：“我苗期后枯”；其三云：“我非徒跣相”；其四云：“笑我归不早”，“皎皎我怀抱”；其五云：“我知公所坐”；其六云：“我顷登罗浮”；其七云：“潮阳隔云海，风晚尚见客”；其八云：“贫苦我为伤”；其九云“亲友復劝我”，“虚名非我有”，“思我无所思”；其十云：“我如终不言”以及其十一云：“我昔登胸山”，“今兹黎母国，何异於公乡”（苏轼，2010：2783）等诗句，作者以重复“我”来述说其海南“出无友”的孤独感以及好客的性格，因此对于友人的到访是相当珍惜的。

苏轼也有将生活写照进一步写到农民身上，借此表达其如何有效开垦田地以便得到农作收获的想法。其《和陶劝农六首》的诗句内容书写了劝勉汉

民与黎民和睦相处以及种树耕作⁴⁰，如其一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其二云：“天祸尔土，不麦不稷”；其三云：“岂无良田，靡靡平陆”、“芋羹藟糜，以饱耆宿”；其四云：“听我苦言，其福永久”以及其六云“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苏轼，2010:4867-4872）。除了劝民耕作，其《和陶赴假江陵夜行》也有一些田园生活⁴¹的诗句，如：“犬吠主人怒，愧此闾里情”（4879）。

另外，苏轼在《和陶西田穫早稻》云：“晚菘先破寒”，“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锄，未免骅我颜”，“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叹”（苏轼，2010:5001）；《和陶下潞田舍穫》云：“黄菘养土膏”，“食菜岂不足，呼儿拆鸡栖”（苏轼，2010:5004）；《和陶戴主簿》云：“手栽兰与菊，侑我清宴终”，“勿笑一畝园，蚁垤齐衡嵩”（苏轼，2010:5008）。以上三首“和陶诗”有两个共同点：一、提及栽种的植物如“晚菘”、“菜”、“黄菘”、“兰”与“菊”；二、描述田园栽种的情景如“农圃乐”、“持锄”、“鸡栖”、“手栽”与“一畝园”。以上诗句为苏轼迁入新居后所得到的生活乐趣，与其《新居》以及《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所运用的诗句以及描写的情景相同。

苏轼在《和陶拟古九首》也有很多书写海南面貌的诗句，如诗其四云：“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云母，何异嵩与邛”、其七云：“来孙亦垂白，颇识李崖州”、其八云：“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復采”与其九云：“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苏轼，2010:4888-4897）。由书写“海南生活”、“劝民耕作”、“田园生活”到“海南风土”，每篇“和陶诗”皆表达作者对海南生活的真实感受，如《和陶拟古》以“稍喜海南州”、“来孙亦垂白，颇识李崖州”、“城南有荒池”与“黎山有幽子”等诗句衬托其对海南的融入以及喜爱。

⁴⁰ 相关论述可详阅〈隔代觅知音：论陶渊明与苏轼的躬耕生活〉。（叶丽媛，2008：20-21）

⁴¹ 相关论述可详阅〈贬谪人生中的田园——论苏轼和陶诗中的田园诗〉。（朱小枝，2011：210）

(三) 亲人与友人互动

由於海南交通不便以及落后的因素，造成了苏氏兄弟的联系困难。苏轼（2010）於《和陶停云四首》多次表达其对苏辙的思念以及担忧，如诗其一论述联系苏辙的艰难、其二云：“念彼海康，神驰往从”（4907）以及其三云：“远虎在侧，以宁先生”（4910）。从诗句可见苏轼与苏辙的感情是非常要好的。元符三年二月，作者在《和陶郭主簿》其一云：“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苏轼，2010：5074）。苏轼在此诗描写了清明时分听见儿子苏过朗诵阅读，因此回想父亲苏洵在其年少时留下的遗意，同时也表达其思念孙子的心情。

另外，元符二年（1099）正月五日，苏轼作《和陶游斜川》提及“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以及“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苏轼，2010:5011）。苏轼在此诗描写了与儿子苏过出游一事，然后在诗句题写了“何异老且休”，表达其怡然自得的心情，以此述说其晚年生活愿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平静。

此外，苏轼曾连作三篇“和陶诗”赠别友人张中，首先在《和陶与殷晋安别》⁴²感激张中曾安置官屋给苏轼居住诗云：“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仍将对床卧，伴我五更春”以及“恐无再见日，笑谈来生因”（苏轼，2010:5018）；其在《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时抒发其珍惜的友谊以及送别的不舍之情，诗云“三年无所愧，十口今同归”（5034）、“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以及“梦中与汝别，作诗记忘遗”（5035）；而在《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云：“留灯坐达晓，要与影晤言”（5037）。

(四) 人生思考

苏轼晚年在海南的和陶心境，也有直白地透露在《和陶示周掾祖谢》。苏轼（2010）於此诗描述自己外游城东的学舍云：“闻有古学舍，窃怀渊明

⁴² 相关论述可详阅〈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韩国强，2001：27）

欣”（4862），其感慨光阴不留人而曰：“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饥坐谈道，嗟我亦晚闻”，“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作者於此诗末句，将自己比作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虞翻，以虞翻贬谪交州之后却不曾因为教学而感到疲倦为例子。苏轼因为自己年老无力教学而感到惭愧。苏轼於惠州以及海南时期，在寄托陶渊明的心态上有分别。苏轼贬谪惠州的时候表现了随遇而安的心态，因此在惠州便有“终焉之意”，很少书写有关谪人心态的诗句。

美国学者艾朗诺（2013）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论述：“苏轼偶尔也会尝试一些突破藩篱的作品，就是用词来记述、表达纯粹的或重要的私人事件（而非普遍社会主题）。这些带有强烈个人性的事件，本该是由‘诗’来表达、记载的，现在却全写进了词中——他甚至在每首词的序中都交代了写作的场景，说明了时间、地点，所寄和人。在这之前，词与作者之间往往没有密切关联，词的主题比较泛化，几乎不涉及作者的私人情感。他的特点就是强烈的个人色彩，他所要表达的，是某个具体的人独特的生活体认与情感，而这个人就是他自己”（211-212）。本文受艾朗诺启发，纵观苏轼在惠州以及海南所作的“和陶诗”，其诗引以及诗歌内容皆有论述苏轼本人以及与其生活相关的经历。由於海南的生活环境恶劣，苏轼於此时期的“和陶诗”创作数量已经达到了扬州与惠州以来的“高峰时期”。从海南时期的“和陶诗”来看，其书写内容已经拓展以及包含了与当地有关的人、事、物。苏轼融入海南的生活之后，说明其对于“亲人”以及“友人”的需要；而“豁达”的心情则表现在“劝民耕作”的用世之心、“书写海南”以及闲适地度过海南的“田园生活”。苏轼在惠州以及海南的“和陶主题”相近，不同的是“海南和陶”提供苏轼更深一层的人生思考。

第三节 从择陶到超越

苏轼在扬州、惠州与海南时期的生活遭遇不同，因此各时期的和陶心态也有所变化，而后世对“和陶诗”则各自提出不同的看法。评论者对于苏轼在海南时期的“和陶诗”，较多认为与作者的创作背景以及生活遭遇有关，所以评论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理解苏轼晚年生活的关键作用。苏轼在海南的“写酒心态”与扬、惠两地不同，海南时期的《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和陶赠羊长史》分别以“戒酒”表达回归自适生活；而扬州《和陶饮酒二十首》则表达“自适饮酒”⁴³；惠州作《和陶贫士七首》、《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与《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则分别表达了“借酒写陶”，三地经历了不同的写酒心态。

翁方纲在《石洲诗话》卷三评《和陶止酒》：“绍圣四年丁丑，先生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有《子由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和元韵赠别》诗五古一首。以上考先生别子由诗次第，大略如此”（曾枣庄，2000:1755）。翁方纲以《苏轼年谱》查证此诗的创作时间以及“和陶”用意，然而没有提及此诗的特色。另外，程钜夫《跋东坡帖》评《和陶赠羊长史》云：“苏公坐谪时，有在都城见叔党而障面者。及迁儋耳，郑嘉会靖老乃能以海舶载书千馀卷为借，亦可嘉已。公和渊明《赠羊长史》诗以谢之，千载而下，知有靖老，士鸟可不自附於青云哉？此帖言所借书收掌如法，前辈借人书籍，爱护如此，皆是盛德事”（1825）。

根据以上评论，程钜夫认为苏轼爱护书籍，乐于阅读，是值得赞颂的事情。透过此诗歌分析，正好说明了苏轼“爱书惜书”的一面。另外，对照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引沃仪仲语评陶渊明《连雨独饮一首》看法：“他作谈生死，犹是彭殇齐化之达观，独此云忘天任真，形化心在，诚有不随生存、

⁴³ 相关论述可详阅〈从“杯酒唱酬“到”追和古人“——试论苏轼和陶饮酒诗的意义〉。（杨治宜，2005：58-67）

不随死亡者”（陶潜，2004：114）。可见，苏轼在海南时期以陶渊明“借酒思考”的本意，以此思考自己的人生，籍此表明其对生活的看法。

苏轼在海南写了许多与“生活写照”相关的“和陶诗”。由苏轼在惠州书写与“游记”、“迁居”以及“自适生活”相关的和陶内容，后来进一步扩写至“劝民耕作”以及“田园生活”的内容题材，更多地说明作者对海南生活与人民的接触与理解。纪昀评《和陶九日闲居》云：“但愿饱秔稔，年年乐秋成”二句，收得和平而满足（曾枣庄，2000：1770）；樊潜庵评：“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纯是达者语。其胸中浩浩落落，绝无一发牵强。患得患失者能之乎？”（1770）以上评论者皆认为苏轼於穷途中，只求生活过得满足，以印证作者是如何以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而樊潜庵也以作者在海南的生活背景评《和陶使都经钱溪》云：“悼古伤今，不堪回首。復叹己之老竄，歌泣怨慕，淋漓满纸”（1803），评《和陶和刘柴桑》云：“真朴似陶”（1765）。

赵克宜在《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九也以相似的看法评论《和陶还旧居》云：“‘瘦人’四句”，四语无限曲折，写来只是一真”（曾枣庄，2000：1764）。赵克宜的评论与苏轼“无限曲折”的处境相同，以此认为作者无法忘怀过去的惠州生活。樊潜庵曾以苏轼在忧患仕途中欣赏陶渊明的“高风逸致”来评论《和陶始经曲阿》，此评论与苏轼对思念惠州白鹤峰旧居的想法相同，评论曰：“靖节高风逸致，空古今无两人。公忧患中心醉久矣。故和陶诸作多自悔自责语”（1844）。

此外，也有评论者认为苏轼用心推动海南的发展，如温汝能《和陶合笺》卷一评《和陶劝农六首》云：“篇内备言不耕之害，力农之乐，谆谆戒勉，公之为琼人计，诚且切矣。然岂独琼人为然，天下游手之徒，闻者应为股栗。而力田者有此乐境，何惮而不竭力为之也？仁人之言，其利溥矣，信哉”（曾枣庄，2000：1766）。王文诰在《苏海识馀》卷一则评曰：“海南《和陶劝农六首》，专因海南而发。其命词用意，无一常语，此杰作也。当落笔

时，其一片精诚皆贯注，於地瘠民贫、俗薄习懒之间，特寄所以哀之劝之之意”（1766）。以上评论皆以苏轼的“和陶诗”创作背景，解析其“用世之心”、“关心海南”以及“与民生活”的一面。

各评论者对苏轼融入海南生活的“和陶诗”也有相近的看法，并认为苏轼书写了许多与岭南相关风土以及田园生活的情节，如戴第元在《唐宋诗本》卷一评《和陶拟古九首》云：“此东坡在儋耳和陶之什。题虽云《拟古》，皆言岭南风土，谪居实事，与从前多作寓言者不同”（曾枣庄，2000：1804）；王文诰在《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二评此诗其一云：“有客叩我门”四句，公在海南，真有此种情状，随手拈来，皆古人所不道”（1805）；樊潜庵评其四云：“四言虽老死遐荒，亦无足憾，即“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1807）。又如樊潜庵评《和陶赴假江陵夜行》云：“写出田家桑梓许多厚道”（1770）。

苏轼与海南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王文诰於《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一评《和陶杂诗十一首》云：今观诸诗，以海南作起结，中托述古以自寓，皆行骸之内也（曾枣庄，2000：1838）；评此诗其二则曰：“‘杂诗’，诗不杂也。十一首，以“我”字作骨，一线穿成。上首从“我忘身”句领起海南，此首道其海南之我，更深一层，进得有叙”（1840）；评其十一云：“收到海南作结，是公本意，故云此十一诗，皆形骸之内也”（1844）；其《苏海识馀》卷一则曰：

儋州和陶以《拟古》之“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二句为《海外集》纲领，其意不肯说坏海南，即《海外集》不肯流入怨望之本旨。灵均之贬，全以怨立言。公之贬，全以乐意为意。《和陶拟古》云“朱刘两狂子，陨坠如风花”，则痛诋焉。公凡与朋侪中，虽交道甚笃，而或於民事一有乖谬，即丝毫不能

假借，此其情性天成，虽至海南，有牢不可破者如此，故其平生积为嫌恨者多也。（曾枣庄，2000：1807）

以上评论者基本认为苏轼在海南的贬居生活与环境恶劣，然而却选择融入海南的生活，并没有任何“说坏海南”之意，契合了作者的“和陶”本意。以下试分析苏、陶诗作最大的区别：晋安帝义熙元年（405）至宋文帝元嘉三年（426）约二十年时间，陶渊明辞官隐居的诗作数量，比“在家闲居”与“任官时期”更多。龚斌（2001）在《陶渊明传论》论述：“陶渊明喜好自然，以及刚直绝俗的个性，其实是归隐的另一重要原因。他追求精神自由，同时不肯向世俗低首的性格，必然会於东晋末年贫卑污下、廉耻丧尽的社会中发生冲突。在他十年左右仕隐不定的经历当中，其始终贯穿着个性与社会的冲突。有时因受贫困的驱使，被迫心为形役；有时不堪忍受羁绊，便又放弃仕途”（47）。

陶渊明经常在隐居的时候，於诗作中表达其对于人生以及隐居的想法，说明出仕并非其志向所在，如《杂诗十二首》其四云：“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百年归邱垄，用此空名道”（陶潜，2010：240）；其七云：“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244）；其十云：“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248）。透过以上例子，可以清楚理解陶渊明在其诗作书写了有关淡泊名利、向往归隐以及追求平淡的想法。

陶渊明归隐期间，在《归园田居五首》多次表达其“离开官场”与“回归田园”的诗句，如诗其一云：“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復得返自然”（陶潜，2010：53）；其二云：“时復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8）；其三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59）；其四云：“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60）；其五“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62）。

“回归田园”是陶渊明晚年的生活写照，主要从事躬耕以及务农的活动，如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首》的诗句描写“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与“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陶潜，2010：157）。此诗真切地将劳动的民生画面表达出来，说明劳作收获的珍贵以及自给自足所带来的安定生活。此外，相关的诗句也表现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一首》。此诗主要描写了苦中作乐的农作生活，诗云：“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以及“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162）”。

宗白华（1981）在《美学散步》解释“汉魏六朝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苦痛的时代，然而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能、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77）。陶渊明曾遥想一个太平社会，如其《桃花源记》并诗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取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愿言躡轻风，高举寻吾契”（陶潜 2010：330）。此诗描绘一个太平的生活面貌，人人过着劳作、和睦、免税与平静的生活，符合了陶渊明理想中的一幅生活图景。

何阿珺（2008）在《陶渊明与苏轼归田情怀之比较》一篇论述：“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后，他的心态呈现平和，其生活态度也是认真的。他精心侍弄自己的庄稼，像真正的农民渴望着一年的收成。陶渊明的归田不是仕途失败、心灰意冷后的消极与回避，他只是在选择文人在“学而优则仕”之外的另一种人生，最终他当了一个农民，或者说当了一个“农民诗人”。他做出这个决定是深重的，也是积极的”（56）。

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评《杂诗十二首》其四：“公本志四海人，但志不获骋后，愿聚天伦之真乐，而於势利空名，直视之如粪土耳”（陶潜，2004：296）。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则评《归园田居五首》其五云：“田家真景，令人悠然”（295）。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卷三引思悦语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首》：“观此诗知靖节既休居，惟躬耕自资，故萧德施曰：“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208）；钟惺於《古诗归》卷九评《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潏田舍获一首》云：“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之语，所以为真旷达也”（210）。后世对陶渊明“田家与躬耕生活”的想法提出了相关的看法，主要分辨陶渊明在“田园”与“名利”之间的选择，勾勒出陶渊明“安道苦节”，并且“不以躬耕为耻”的为人形象。陶渊明因为旷达的性格，因此过着自适平淡的理想生活。

温汝能则在《陶诗汇评》卷二评论《岁暮作和张常侍》云：“此篇音节悲古，起结尤感叹欲绝。盖人生境遇无常，抚己慨然，正非渊明所独。惟渊明当日之怀有难以告人者，故其触景增慨，比他人为独深也”（陶潜，2004：151）。而蒋薰在《陶渊明诗集》卷二评《酬刘柴桑一首》：“此诗只说自己穷愁行乐，绝无酬答语，故知陶、刘相契在形迹外”（127）。对于陶渊明的生活理念⁴⁴，评论者皆有给予认同的看法，主要认为陶渊明已经看破人生无常，放下世俗的羁绊。

苏轼在惠州书写有关亲情与友人的“和陶诗”，内容主旨包括“亡妾王朝云”、“迁入新居”以及“赠友人诗作”；而在海南书写的亲人与友人更是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刘克庄在《和陶停云四首》评曰：“东坡方得意时，为执政侍从。及其失意，至下狱，过岭，晚更忧患，于是始有和陶之作，不知渊明印可否”（曾枣庄，2001：1773）；樊潜庵评其三：“忧患之语，读之悽然”（1774）。王文诰则评论《和陶影答形》曰：“此首多本色”（1709）；纪昀评《和陶形赠影》云：“本是理题，遂不嫌作俚语，言固各有当也。此首多陶意”（1708）。陆莹《问花楼诗话》卷二则评《和陶游斜川》云：“先广文爱其和陶诗，以谓此老晚年进境”（1790）；而温

⁴⁴ 周晓琳在〈平淡出於自然——陶渊明“自然”心态解析〉认为，陶渊明具有明显的好静、独处倾向，能够理性的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善于把握自己的思想情感。（周晓琳，2003：42-46）

汝能在《和陶合笺》评：“起语着一‘澹’字，便觉高远，气味逼真渊明。以迁谪之况，而得澹然无事，可谓乐天如命，随遇而安，东坡之胸次过人远矣”（1791）。

以上各家较多以作者晚年身处海南的生活背景作为评论基础，分析了苏轼随遇而安的生活心态，同时也少不了珍惜亲人以及友谊的需要。温汝能与樊潜庵分别评苏轼《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与《和陶答庞参军六首》的看法相似。温汝能在《和陶合笺》卷一评《和陶与殷晋安别》曰：“末段语别意拳拳，读之真令人恻然泪下”（曾枣庄，2001：1817）；而樊潜庵评：“三诗（指此首及《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和陶答庞参军六首》）於愤懣中忽作旷达语”（1817）；其评《和陶王抚军座送客》则云：“三诗（指此首及《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答庞参军六首》）於愤懣中忽作旷达语”（1818）；评《和陶答庞参军六首》云：“三诗（指此首及《和陶与殷晋安别》、《和陶王抚军座送客》）於愤懣中忽作旷达语”（1818）。评论者认为以上“和陶诗”表达了苏轼“别意”、“恻然泪下”、“愤懣作旷达语”的内心想法，同时认同苏轼诚意对待友人的个性，反映苏轼在海南“出无友”的情况之下，对於“友情”的重视。

温汝能《和陶合笺》卷二评《和陶郭主簿二首》云：“先生三子，过尤有父风。儋耳为极边烟瘴之地，观其负担从行，艰难万状，而能曲体亲心，力学不倦，非其中有定见，外物不移者，能若是乎？要惟以诗书世其家者，乃能不坠厥声也（曾枣庄，2001：1795）。樊潜庵评此诗：公幼子过，万里待行，颠沛流离中，犹不废学，尚可责之乎”（1795）。纵使海南为“烟瘴之地”，苏过依然跟随以及服侍父亲苏轼。苏轼认为儿子的孝顺以及好学是非常难得的。以上两家的评论分析，更加贴近地说明了苏轼与苏过在海南的生活互动。

陶渊明在隐居的时候常常与友人分享喜悦，如其《酬刘柴桑一首》云：“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

良日登远游”（陶潜，2004：100）。此诗为陶渊明安於隐居以及和家人共度天伦的生活画面，表明其甚少应酬朋友的生活习惯，并且以此酬谢刘柴桑友人的外出邀请。此诗与苏轼《和刘柴桑一首》的表现手法相同，同样描写了淡泊名利以及向往躬耕的生活，诗云：“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95）。

陶渊明曾於《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告知周续之、祖企与谢景夷三位友人讲述孔子之业甚为勤苦，何不随其隐居，诗云：“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陶潜，2004：69）。此诗说明了陶渊明拒绝友人刘柴桑邀请其入住庐山，并述说自己与亲友邻居安乐与躬耕的平静生活，别无它愿。陶渊明於此诗的内容主旨与《赠羊长史一首》所云：“驷马无贵患，贫贱有交娱”（113）的诗句相似，可见陶渊明以劝说友人随其归隐为由，表明自己远避世俗的想法。

陶渊明大部分的晚年生活在隐居中度过，大部分评论者认为其交友态度一丝不苟，并且抱持着“友谊之道”的态度。温汝能在《陶诗汇评》卷二评曰：《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首》云：“是时三人皆讲礼校书，周续之已入庐山，会刺史檀韶苦请出州，在城外讲礼，所住公廨復近马队，故靖节姑示以己之安闲，中则抑扬其词以深规之，末用冷讽，语虽诙谐，意本肫切，古人交谊不苟，於斯可见”（陶潜，2004：93）。温汝能评《答庞参军一首》五言则云：“陶公小序，多雅令可诵。序中起数语，何等缠绵，令人神往。至其与人款接，往往於赠答之什，自有一种深挚不可忘处，此古人所以不可企也”（106）。蒋薰在《陶渊明诗集》卷二评《酬刘柴桑一首》云：“此诗只说自己穷愁行乐，绝无酬答语，故知陶、刘相契在形迹外”（127）。孙人龙纂辑《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评《答庞参军一首》四言则云：“高雅脱俗，喻意深阔。交情笃挚，妙能写出”（34）。钟惺《古诗归》卷九评《移居二首》其一云：“二诗移居，意重求友，其不苟不必言”（117）。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评《与殷晋安别一首》曰：“序则真序，

情则真情。此人公不重之以为道义交，所谓‘故者无失其为故’也。语不假借，亦无讥讽轻慢。青天白日，分寸不溢，公所以为修词立诚，为有道之言也。情词芊绵真挚”（142）。方宗诚评《和刘柴桑一首》曰：“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得君子居易以俟命之义。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利念名念扫除净尽，岂可以旷达目之？”（125）

据上而论，评论者的看法多有相似之处。以上的评论句子如“绝无酬答语”、“古人交谊不苟”、“交情笃挚”、“至其与人款接”与“意重求友”，皆是评论者认为陶渊明在“择友”与“交友”之间的为人态度，说明其性情真挚以及甚少应酬朋友的性格。根据后世的评论观点发现，陶渊明的人生不为名利所累，最终在仕与隐的矛盾之间选择隐居，因此如愿过着田家农耕的生活，得到了人生思考的启发。如此，陶渊明晚年的生活背景与诗作内容相同，烘托了陶渊明的“文”与“德”的为人形象，与各家评论者所提出的看法相互可参照。

在“人生思考”方面，樊潜庵评苏轼《和陶示周掾祖谢》云：“盖公尝曰‘清忠亮节，希圣希贤。煞有定见，乃能冲口道出。其得祀於海外，岂偶然哉？’”（苏轼，2010：4764）。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也有一些厌弃世俗与隐居自适的想法，如此诗其一云：“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陶潜，2010：271）；其二云：“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275）；其五云：“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278）；其七云：“灵凤抚云舞，神鸾调玉音。虽非世上宝，爰得王母心”（280）；其十一云：“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285）；其十二云：“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286）。

陶渊明曾对古代贫士进行歌咏，表达其对于安贫乐道以及不求名利的人生思考，如《咏贫士七首》其一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陶潜，2010：252）；其二云：“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253），、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254）；其三云：“重华去我久，贫士世相寻。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岂忘裘轻裘？苟得非所钦”（255）；其四云：“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256）、“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257）；其五云：“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258）；其六云：“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259）；其七云：“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260）。

黄文焕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云：“黄文焕《陶诗析义》卷四：“结句独曰‘宁效俗中言’。有世外之品格者，亦必有世外之文章，寄意愤俗，别开枝节，题是读《山海经》，故每首必另翻议论”（陶潜，2004：338）。刘履《选诗补注》卷五则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云：“观其‘众鸟有托’、‘吾爱吾庐’等语，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则其俯仰宇宙，而为乐可知矣”（337）。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评《咏贫士七首》其七云：“此借古人以自况其彭泽归来与妻孥安贫守道之意。本传称其妻翟氏亦能安劝告，与公同志，‘年饥感仁妻’数语，似为此而发”（325）。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卷四评《咏贫士七首》其一云：“独无攀缘飞翻之志，宁忍饥寒以守志节”（313）。

据上而论，黄文焕、刘履、邱家穗与汤汉皆认为陶渊明有厌倦世俗、向往隐居、追求怡然自得、高尚、随遇而安以及知足的想法，说明了陶渊明选择归隐生活的坚定。陶渊明晚年虽然生活贫苦，其主要从事躬耕以维持生活，很少为此担忧或抱怨，反而展示其知足乐天的个性。

评论者对苏轼惠州与海南时期的“和陶诗”看法，多数以作者的和陶背景以及生活遭遇进行对照以及论述。评论者对苏轼在扬州、惠州以及海南的和陶评论各存差异，主要的原因是：一、苏轼外任扬州的时候，没有太多像

贬居惠州与海南的生活困苦以及凄苦画面；二、苏轼於三地的官职以及仕途遭遇不同，造就苏轼的和陶心态逐渐转向“生活记录”，以此作为“和陶诗”的内容主旨；三、海南生活环境的恶劣，使到苏轼更进一步向往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以“和陶”的方式找到精神寄托。因此，可以发现多数评论者的看法更加贴近苏轼的生活背景以及仕途遭遇。总而言之，苏轼在海南“和陶诗”与其生活遭遇有许多相关的参考作用，加上海南时期的“和陶诗”之创作数量已经进入“高峰期”，因此评论者对苏轼的生活面貌给予了更多的理解以及评论。

陶渊明曾曰：“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及“不慕荣利”，以此表明其心志不在名利并且将其置於身外。此外，陶渊明也乐於“好读书”以及“常著文章自娱”，因此可以理解其向往耕种与隐居的生活，正如李剑锋（2005）在《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云“陶渊明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他愿意放下士大夫很难放下的架子，从事农耕劳动，并从心理上接纳了农耕劳作，在劳动当中探求和定义生命的意义，把劳动当作生命的根基”（21）。陶渊明偶尔思考人生，虽然与友人甚少往来以及应酬，然而却有诗作赠予友人。“陶诗”的思想内容多反映在“厌弃世俗与名利”、“隐居之乐”、“思考人生”、“田园生活”与“赠友人诗作”方面。陶渊明在“陶诗”的情感表现与其生活关系密切，也反映陶渊明心目中的归隐生活已经实现。

苏、陶在诗歌创作的主题相似，但创作心态以及作诗特色多有不同。苏轼於“和陶诗”表现其“向往安稳生活”、“离别与思念亲人”、“生活困苦”、“劝民耕作”、“田园生活”、“海南风土记录”、“友人到访”与“赠友人诗作”。苏轼於岭南的生活过得平淡，因此向往陶渊明的归隐生活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

美国学者林顺夫（2005）在《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认为：“隐士往往受到推尊和揄扬，因为他们道德正直，思想高洁，并且不为权势、财富和名声所缚累，能以一种合乎理想的方式生活。但是，中国社

会将仕途看得重于一切，因而要做无意进取的隐士绝非易事”（11）、“陶渊明本人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步入官场的时光不长，很快就退居田舍，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穷困生活。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艺术、思想一致。尽管如此，在他的诗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强调思想的高洁与超脱，并将之视为隐士生活的旨归”（15）。

苏轼虽然欣赏陶渊明的“为人”以及喜爱“陶诗”，然而却始终没有归隐。苏轼没有按照陶渊明的作诗系年以及顺序进行“和陶诗”创作，但却选择性地效仿陶渊明，实现了“田园与农耕生活”，另一方面却按照其“和陶”方式於逆境中坚强生活，从来没有放下“用世之心”⁴⁵，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处事心态，成为苏轼贬谪岭南时期的鲜明形象。

综上所述，苏轼前后约以八年的时间进行“和陶诗”创作，效仿陶渊明的为人以及近三十年的晚年诗作，其不仅没有像陶渊明真正归隐，反而融入逆境中的贬居生活，以豁达的心情於低谷的晚年时期看待人生，排遣贬谪的生活命运。

结语

总结本文，苏轼遭遇贬谪岭南的重大打击，让其人生落入了一个黑暗时期。从苏轼“慕陶”一直到“择陶”，大部分的“和陶诗”内容反映其晚年的生活事迹，同时借此得到排遣忧患仕途的契机。苏轼於扬州时期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的时候，并没有预知自己将会有“尽和陶诗”的想法，然而随着接踵而来的贬谪遭遇，惠州以及海南之贬正符合其“半生出仕，以犯世患，

⁴⁵ 苏轼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陶渊明重新进行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外壳之中，形成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对苏轼来说，陶渊明正仿佛是一处平静的水面，使自己得以沉浸其中，以清醒的意识与吟咏映照在水面上的自我和生命的实相，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内在超越和净化，详阅〈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丁晓、沈松勤，2003：18）

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的说法，促使其作出“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的决定，以致岭南时期的“和陶”心态已然成型。

随着苏轼外任扬州，贬居惠州与海南三个时期的“托陶”之意，其“和陶”数量逐渐有增加的趋势。从苏轼踏足扬州至到岭南时期为止，其“和陶诗”总共累积了一百二十四首。苏轼在惠州“和陶”主要反映其生活上的经历，与扬州的“和陶”背景不同；而在海南“和陶”则明显题写了更多与其生活相关的内容主旨，将其视为可以寄托的“知己”以及“排遣”苦闷心情的“必需品”，同时也是创作“和陶诗”以来，数量达到最多的时期。苏轼生活在“非人所居”的海南，更进一步说明了“和陶”的必要，展现其忧患处境的“择陶”决定，以寻求生命价值的心态作为真正的“和陶”本意。

扬州与惠州的“和陶”内容多有不同，前者“和陶”与作者外任的仕途经历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后者“和陶”却丰富了创作主题，填补了更多后世理解苏轼晚年生活的真实面貌。究其缘由，“和陶诗”的真实轮廓主要源於作者的贬居环境、仕途不达的处境以及谪人心态，使“和陶诗”的数量於此时期发生了变化，由此进入了“发展时期”。纵使苏轼在惠州以及海南两地作了一些与其生活经历无关的“和陶诗”，说明了“和陶”并不是唯一的记事选择，但是透过苏轼於两地所作的诗、文以及“和陶诗”所表达的内容想法，皆提供了后世参考苏轼晚年事迹的关键作用以及空间，以此理解苏轼在困顿的人生中，起了一个“不得不和陶”中介作用，引领苏轼走向自己向往的旷达之路。

苏轼的晚年事迹映照在“和陶诗”之下，苏轼得以借此说明其随遇而安的豁达人生，谱写其在惠州向往的“稳定居所”以及“重视友谊”的心情剖白；而海南的生活环境比惠州更为恶劣，使其有机会对自己人生注入一个全新的诠释，更深一层的人生思考空间。苏轼透过与陶渊明频密的隔空对话，最终将“和陶诗”的面貌扩大至“高峰时期”，多数反映了苏轼对生活困境所提出的疑问，让其在困顿的人生当中不断地寻找答案。苏轼在许多无法预

知的人生遭遇中，於岭南清楚自己对“亲人”与“友人”的需要；而豁达的心态则表现在融入海南的生活节奏，以“劝民耕作”的用世之心，“认识海南”的平静心态以及安乐知足地度过海南的“田园生活”。苏轼唯有透过意犹未尽的“和陶”抒发，才能在许多的人生疑惑当中得到答案，不断地丰富心灵，滋养自己的灵魂。

“和陶诗”内容的不同，也让后世给予了不同的评论以及看法。评论者多数以理解苏轼的人生遭遇以及生活背景作为评论的基础，解读苏轼於岭南的“和陶”心态，提供更多思考的空间，以回顾苏轼晚年岭南时期的生活以及人生遭遇，贴近苏轼的“和陶”本意。比较苏轼各时期的“和陶诗”内容，可发现苏轼与陶渊明在晚年事迹以及作诗心态方面的不同。在“师范”陶渊明为前提之下，苏轼以超越其忧患仕途的心路历程中，展现了可贵的人生价值观。因此，苏轼以此方式度过了艰辛的晚年以及岭南生活，充分说明了陶渊明或者有不能“苏轼之所能”，然而苏轼却以陶渊明作为心灵寄托的对象，不断地向往陶渊明诗作中所表现的归隐思想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

换言之，苏轼在穷途末路的时候，始终选择了陶渊明作为知己，然而却没有选择像陶渊明那样走上归隐的道路。苏轼没有按照陶渊明的诗作系年进行“和陶”，可是却以岭南的生活经历，选择性地借鉴“陶诗”的诗歌内容，吸收洗涤负面想法的养分，以效仿陶渊明为目标，实现其向往陶渊明诗歌作品中的“田园与农耕生活”，以此融入逆境中的贬居生活。透过苏轼与陶渊明的隔空对话，苏、陶诗歌也同时得到升华，让后世理解苏轼对於陶渊明的重视，重新确立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苏轼由始至终不曾放下“用世之心”，在逆境中以“和陶”的方式突破各种人生关卡，谱写了一段岭南时期的坚强人生。

由於此论文以锁定苏轼晚年岭南时期的“和陶诗”作为首要的研究目标，日后仍然有许多延伸的空间讨论“和陶诗”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文学地位，因

此笔者於此研究作为本人的研究基础，期望可以更深入地拓展“和陶诗”的研究。

引用文献

- 艾朗诺（2013）。《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等译；郭勉愈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包弼德（2001）。《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陈邦瞻（1997）。《历代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
- 陈润隆（2016）。〈苏轼和陶饮酒诗中的“苏意”〉。《汉学与佛教：第十届马来西亚汉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页 197-216。霹雳：马来西亚汉学研究会。
- 程杰（1999）。《宋诗学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戴均良（2005）。《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丁晓、沈松勤（2003）。〈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浙江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页 111-119。
- 房玄龄（1998）。《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 高云鹏（2008）。〈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渤海大学学报》2008 年第 6 期，页 74-82。
- 郭绍虞（1983）。《清诗话续编》（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龚斌（2001）。《陶渊明传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顾宏义（2010）。《宋朝方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顾炎武（2003）。〈日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58 册）（纪昀、永瑢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韩国强（2001）。〈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1 期，页 25-28。
- 何阿珺（2008）。〈陶渊明与苏轼归田情怀之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8 年第 4 期，页 54-62。
- 黄庭坚（2011）。《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黄伟伦（2006）。〈论苏轼和陶诗中的‘本色’意义〉。《高雄师大学报》2006 年第 21 期，页 33-48。
- 黄宗羲（2012）。《黄宗羲全集》（吴光主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金甫璟（2008）。《苏轼“和陶诗”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复旦大学，上海。
- 金强（2004）。《宋代岭南谪宦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暨南大学，广州。
- 金准锡（2012）。《中国古代饮酒诗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南京大学，南京。
- 孔凡礼（2004）。《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 李剑锋（2002a）。《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济南：齐鲁书社。
- 李剑锋（2002b）。〈苏轼和陶诗深层意蕴探论〉。《九江师专学报》2002 年第 3 期，页 15-20。

- 李剑锋（2005）。《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 林红（2016）。《苏轼与酒及涉酒诗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 林顺夫（2005）。《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张宏生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宾虹（2008）。《“三苏”咏史怀古诗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 刘尚荣（2004）。〈宋刊东坡和陶诗略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页 457-458。北京：学苑出版社。
- 刘圣宜（2007）。《岭南近代文化论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刘恂（1988）。《岭表录异》。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
- 马端临（1986）。《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
- 内山精也（2005）。《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尚永亮（2007）。《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苏辙（2009）。《栾城集》（苏辙著；曾枣庄、马德福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苏轼（1999）。《苏轼诗集》（[清]王文诰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
- 苏轼（2001）。《苏诗汇评》（曾枣庄主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苏轼（2002）。《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著；邹同庆、马德福、王宗堂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苏轼（2003）。《东坡志林》（苏轼撰；朱易安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 苏轼（2010）。《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著；张志烈、马德福、周裕锴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谭其骧（1982）。《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
- 陶潜（2007）。《陶渊明诗笺证稿》（王叔岷撰）。北京：中华书局。
- 陶潜（2010）。《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撰）。北京：中华书局。
- 陶潜（2004）。《陶渊明集校笺》（龚斌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脱脱（199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 王启鹏（2007）。《苏轼文艺美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王启鹏（1990）。〈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惠州和陶诗浅谈〉。《惠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页62-69。
- 王启鹏（2008）。〈同是遭贬谪，为何苏轼填词越后越少〉。《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页5-7。
- 王启鹏（2010）。〈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页27-30。
- 王若虚（2003）。〈滹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纪昀、永瑢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守国（1990）。《酒文化中的中国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王水照、朱刚著（2004）。《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水照（2015）。《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北京：中华书局。

- 王象之（2012）。《輿地纪胜》（王象之编著；赵一生点校）。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
- 王友胜（2010）。《苏诗研究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魏征（1973）。《隋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 魏小利（2014）。〈苏轼和陶诗分类研究〉。《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页93-98。
- 严绍盪（2005）。〈比较文学论文写作的基础与规范〉。《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页55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萧统（1986）。《文选》（[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萧庆伟（2001）。《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薛天纬（2009）。〈师范渊明，唯取一适——苏轼为什么要写和陶诗〉。《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5期，页66-71。
- 薛颖著（2009）。《元祐文人集团与元祐体》。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徐公持（1999）。《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杨玲（2009）。〈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页57-62。
- 杨胜宽（2010）。《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杨治宜（2005）。〈从“杯酒唱酬“到”追和古人“——试论苏轼和陶饮酒诗的意义〉。《学科专论》2005年第2期，页58-67。
- 杨子怡（2008）。《韩愈刺潮寓惠比较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叶丽媛（2008）。〈隔代觅知音：论陶渊明与苏轼的躬耕生活〉。《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8年第10期，页20-21。
- 袁行霈（2003）。〈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页149-161。
- 袁行霈（1997）。《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宇文所安（1996）。〈地：金陵怀古〉（陈跃红、王军译）。《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乐黛云、陈珏编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曾辉（2008）。〈“平淡”中的“至味”——苏轼“平淡”诗论探微〉。《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6期，页22-25。
- 曾枣庄、吴洪泽（2010）。《宋代文学编年史》。南京：凤凰出版社。
- 张帆（2008）。〈别有天地非人间——浅析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页72-75。
- 张宏生（1984）。〈苏东坡的和陶诗〉。《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页52-55。
- 张宏生（2001）。《宋诗：融通与开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张谦宜（2002）。〈緹斋诗谈〉《续修四库全书》（第1699册）（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张小丽（2006）。《宋代咏史诗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 赵芳（2008）。《苏轼海南创作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 郑芳祥（2006）。《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周去非（1999）。《岭外代答》（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周晓琳（2003）。〈平淡出於自然——陶渊明“自然”心态解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页42-46。
- 朱靖华（1997）。《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
- 朱小枝（2011）。〈贬谪人生中的田园——论苏轼和陶诗中的田园诗〉。《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7期，页209-211。
- 宗白华（1981）。《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